

文史拾趣

- “海内外中华儿女”提法的由来 (39)
- 历史上真实的女儿国 (40)
- 古人的环保意识 (42)
- 历史上确有李元芳 (43)

志鉴动态

- 市地方志办公室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
十八大精神 (45)
- 西安市第二轮修志工作分类座谈会召开
..... (46)
- 西安市第二轮区县志编纂质量研讨会召开
..... (47)
- 《西安年鉴》(2012 卷)出版发行 (48)

知识窗

- 中国楹联简史 (49)
- “衣冠禽兽”原是褒义词 (50)
- 宋朝的三公经费 (50)
- 古人常说学富五车,五车到底能装多少书?
..... (51)
- 古人如何预测天气? (51)
- 古代是如何处理垃圾的? (51)
- 元上都遗址成为中国的第 30 项世界文化遗产
..... (52)
- “掌故”原是汉文官 (53)

历代诗人咏长安

- 《游终南山》..... (唐)孟 郊 (55)

解字

- “几” (13)
- “八” (37)

名句欣赏

- 【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等五句 (31)

《西安地方志》编辑委员会

主 任:冯艳阳

副主任:姚敏杰 任昆明 张 帆
王 莹

委 员:崔义萍 杨军亚 彭栋为
高长安 姚文东 崔桂琴
富小云 张 耀 高 鹏

《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主 编:姚敏杰

副 主 编:高长安

责任编辑:宋亚颖 何彩云

主办: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辑:《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地址:西安市凤城八路 109 号市政府
大院 26 号信箱

邮编:710007

西安地情网:www.xadqw.cn

西安市地情资料信息中心基础数据库

<http://125.76.215.234:8080/difangzhi/>

E-mail:changannan6861@sohu.com

电话:029-86788731

《西安历史大词典》总序(二)

中共西安市委副书记 市长 董 军

西安,位居中国六大古都之首,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是一座承载着中华传统文明和古代东方文明的古老城市。

这座城市,有着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这里生活过旧石器时代的蓝田人,这里有黄河流域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村落——半坡遗址,是中华民族发源地之一。3100多年的建城史,1100多年的建都史,充分展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辉煌。唐长安城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国际化大都市”,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

这座城市,有着保存历史文化的传统。汉代,司马迁在此所著《史记》,位列二十四史之首。唐代,这里成就了《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等史书,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正是西安一代代人的保护,才形成了收藏中国古代碑石时间最早、名碑最多的艺术宝库——西安碑林博物馆,保留了我国现存规模最大而又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建筑——西安城墙。丰富的历史典籍和历史遗存,构成了西安深厚的文化底蕴。随着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博物院、大雁塔北广场、大唐西市博物馆、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等历史文化景区的相继建成,一座具有鲜

明历史文化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正展现在世人面前。

如今,在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的组织下,通过相关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西安历史大词典》系列书籍即将付梓出版,又为传承西安历史文化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西安历史大词典》包括《汉代长安词典》、《唐代长安词典》、《明清西安词典》和《民国西安词典》。整套书籍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时间跨度长,记述新中国成立前的西安历史,长达几千年;二是资料覆盖面广,涉及各类史料数百种,收集整理难度大;三是成书规模大,系列书籍共四册,近400万字,2万多词条,600多幅图片,是对西安历史文化发掘、整理和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西安历史大词典》的编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既是对西安历史文化的一次回顾和巡礼,也是对未来西安文化发展的引领和鞭策,同时也成为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取之不竭的宝贵资源。衷心地希望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在今后的工作中再接再厉,不断延伸工作触角,挖掘地情资源,为推动西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新的贡献。

2012年9月

村落是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向上追溯,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祖先生活过的村落。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一个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或其他项目的实施,加之村落自身的开发等,村落在巨变,部分村落在消失。

为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为西安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服务。经市政府同意,由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负责征集西安村落资料,《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西安村落记忆〉资料征集工作的通知》(市政办发[2012]18号)已经下发。我们拟在资料征集工作完成后,编纂出版《西安村落记忆》(上、中、下),同时在“西安地情网”上开设相关专栏,留存西安村落资料,宣传西安村落。

本刊开设“我们的村落”栏目,目的就在于,配合该项工作的开展,讲述西安各个村落的发展轨迹,唤起记忆,畅想未来。

永 宁 村

(南稍门社区居委会)

永宁村,位于大南门外南稍门什字东南端。听村里老人们讲,在旧社会叫郝家坟,据说是一位朝廷命官(武将)葬于此地,一户常姓人家在此为郝家照看祖坟。解放前,来自五湖四海的逃荒者在此租地居住,开垦土地、种菜、做小生意,由此逐渐群居,形成村落。土改入社后依据西安古城门(南门)永宁门定村名为永宁村。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和演变,永宁村也经历着巨大的变迁,20世纪60年代曾将村名改为红卫大队(红卫公社)。文化大革命后又恢复村名为永宁村。20世纪70年代根据上级指示,曾将永宁村、南廓村、南关村、夏家庄四村合并为永宁门大队。20世纪70年代末期永宁门大队解散,又恢复永宁

村村名至今。

在永宁村人的记忆里,解放前有几件大事:北洋军阀及刘振华围城;民国十八年至民国二十年的三年年馑(1929年至1931年关中连续三年大旱,六料未收,西安周边及永宁村一带属重灾区);抗战时日本飞机轰炸西安等;这些相关史料都有记载。



2000年永宁村街道改造

●我们的村落●

永宁村有刘、常、贾、李、邢、王等姓氏，民风淳朴，祖上即有互助互帮传统。因永宁村历史悠久，几百年来，形成的风俗习惯，都蕴含着古长安，周秦汉唐文化渊源和历史遗风，具有关中道浓厚淳朴的农耕文化气息。

解放后隶属西安市人民政府九区乡政府管辖。1952年土改后成立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便于农业生产。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属雁塔区政府管辖。早期，人口约200余人，40余户，耕地面积约300余亩。村民入社时主要物资有土地，水车，牛，马，羊，大车等，土地大致分布在居住地周边，付村、丁白村、吉祥村等地，在成立人民公社阶段，经上级政府统一调剂，就近按需要求，实行土地“一平二调”，基本形成土地大块整体形态。后为解决城市居民菜篮子问题，经上级决定将本村及周边村由种植粮棉为主划转为以种植蔬菜为主。

20世纪60年代，村中相继成立了副业组，有奶牛场，养猪场，车马店，茶铺，磨坊，机

械加工厂。20世纪70年代，村中又办起了装订厂（印刷厂），食堂，运输队（架子车，马车），汽车队，旅社，汽修部（打气、补胎），人均收入逐年递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先后扩大了机械加工厂，淘汰了架子车，马车等运输工具，重新扩充了以汽车为主的运输队，印刷厂的实力也得以增加，集体经济稳步发展。1980年村中有部分村民农转非。

1995年以后，按上级文件要求取缔了一些有噪音，有污染的加工企业，向第三产业发展，投资兴建了听雨楼、延水长、国旅夜市等，租赁沿街商铺及集体所属房屋场地，提高村民收入。

2005年根据市政发(2005)(92号文件，市政府办公厅，市政办发(2006)99号文件，市政府办公厅市政办发(2004)139号文件及城中村工作领导小组发碑城中村字(2006)05号文件精神，成立陕西永盛置业开发公司，按照上级的“四字”方针：自我改造，自筹资金，自我

安置，自谋出路，并于2006年6月底农村户口全部转为居民户口。

2008年8月，经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政府批准，撤销碑林区永宁村民委员会建制，按照“维护安定团结，实现平稳交接”的原则，原永宁村村民委员会成员自然过渡为南稍门社区居委会成员。2008年11月，永宁村全体村民响应政府号召，积极配合政府进行拆迁改造自行过渡。



2012年城改中的永宁村(南稍门居委会)

南关村

(南关社区居委会)



城改前的南关村

南关村以西安市碑林区南关西后地（现城堡酒店南门广场西侧地址上）为核心，由于地理位置位于西安市大南门外，“南关”关内所以起名南关村，20世纪50年代初，综合性高级合作社时期组建成立。2009年5月组建南关社区居委会，现有272户，669人。

高级合作社时期本村属于半蔬菜、半粮棉体制，可耕地面积约有200余亩（分布在今振兴东、西巷、小雁塔寺东、小雁塔寺西，建设西路、太白南路、木塔寨等区域）。当时约有30余户、400余人，骡子、马20匹，马车7辆，饲养室12间大瓦房。村民以种地为主，马车运输为辅，劳动日价值1元人民币。

1958年人民公社时期，本村由一、二、三小队（组）组成，设有农业生产股、副业股、饲养股、技术股、文教卫生股、保管股、运输股。形成了以西安市碑林区永宁公社为主管上级的农业大村。

1959年后随着学生回村劳动，也给村上带来新的变化。建成了30余亩的蔬菜试验站，使蔬菜产量有了大幅度提升，特别是自行培植的大白菜、芹菜、萝卜，受到了广大市民的欢迎。组建了南关村面粉加工场，为本村和邻村村民加工生活口粮，为本市各大食品厂进行原料加工（如：绿豆、江米、白糖、红糖、荞麦、芝麻等）。1960年组建了南关村豆腐厂，将生产出来的豆腐送往西安市副食品蔬菜公司。1961年组建了每年可饲养繁殖100多头猪的养猪场，将成猪交往原西安市肉食品公司生猪收购站。1971年组建了南关机械加工厂，成立有2名经过专业培训的赤脚医生和建筑面积20平方米的南关医疗站。同年由本村自编、自导、自演的忆苦思甜歌舞剧《收租院》到各区巡回演出。其间，还组建了具有绑芯子、踩高跷等各区规模最齐全、最宏大的南关社火队。每逢节日，进行社火表演。自发组

●我们的村落●

织红、白喜事的理事会,20世纪90年代以前用非常古老、通俗的方式操办。此后,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家庭经济收入的提高,办喜事时,一般都在饭店、宾馆摆酒席答谢亲朋好友。在丧事方面遵守国家的政策和规定将土葬改为火葬。

20世纪70年代初,本村由原“半蔬菜、半粮棉”体制转变为全蔬菜体制,在体制上有了实质性的变化。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本村的村办企业和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绩。1979年本村组建了具有100余间客房、安排劳动力20多人的大型住宿旅社《南关旅社》,年收入约为人民币18万元。当年就收回了该旅社的全部投资。1980年,本村废弃了原南关机械厂,先后组建了大型停车场和规模较大的轻工业品展销馆,使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改

革开放思想进入本村,与本村村民的勤劳朴实融为一体。1981年在太白路组建了可安排劳动力20余人、每日可加工约12500公斤原粮的大型面粉加工场“南关面粉厂”,当年就收回该厂的全部投资,年经济收入约为20万元人民币。1984年,废弃南关旅社、停车场、工业品展销馆三个企业,与新加坡外商合资组建了全国首家农村与外商合资的长安大酒店。2001年,本村党支部荣获了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光荣称号,受到了中共陕西省委的表彰。1988年由于城堡酒店的组建,本村一部分村民的住宅地由南关西后地搬迁到小雁塔寺东(今友谊西路南关新村),1994年建造南门广场,将另一部分村民的住宅地拆迁到建设西路(今南关村建设路小区)。

2006年,根据市区文件精神,列入城中村改造范围。清产核资是集体总产值4700余万元,

其中土地估值1800余万元,集体经济转股份制的工作尚待进一步落实。

2008年9月28日,经西安市碑林人民政府批准,南关村村民委员会建制改为南关社区居委会,其行政关系仍由碑林区农村工作局代行,长安路街道办事处配合做好指导工作。



城改后的南关村(南关居委会)

张学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4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主要发动者,周恩来对其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让我们再次勾起那段回忆。

张学良 送蒋介石回南京

一声春雷 保安惊喜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为了逼蒋抗日,发动了“西安事变”。张学良立即向中共中央通报,说他们扣留了蒋介石,并提出八项主张,请中共中央速派代表到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事。

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是陕北一个古老的小镇,名曰“保安”。红军来了以后,保安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在保安炮楼石壁上的一孔窑洞里,毛泽东办公室的灯光整夜亮着。他刚刚看完文件,正在沉思。这时,机要科长叶子龙兴冲冲地走了进来。

“报告主席,蒋介石在西安被捉了,刘鼎同志刚发来电报。”叶子龙说完将电报递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仔细看着电报,浑身充满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警卫员贺清华照例来给他倒水。毛泽东说:“贺清华!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把蒋介石扣起来了,赶快把这封电报送到张闻天同志那里去,请他召集所有的政



治局委员开会。”

蒋介石被扣的消息,像一声春雷,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惊醒了保安镇酣睡的人们。曾三(湖南益阳人,1925年入党,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1年到中央苏区,并参加了长征。)听到这个喜讯后,坐在灯下翻阅文件,时看时停,像在思索着什么。

经过了紧张的研究和磋商,在张闻天的窑洞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立即给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复电,赞扬他们的正义行动,马上派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参加谈判。同时,决定通电全国,

● 历代名人与西安 ●

表明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为了确保“西安事变”向有利于抗日方面发展,中共中央还命令红军主力进驻延安地区,并准备开往关中一带,以便与张学良、杨虎城一起,粉碎亲日派的武装挑衅,以促进西安事变的圆满解决。

“恩来此行 任重道远”

中央代表团的成员除了有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之外,随同前去的还有邓发、李克农、李涛、罗瑞卿、曾三、童小鹏等人。

次日凌晨,鹅毛大雪还在不停地下着,那高山,那树木,那窑洞,那田地,全都披上了一层厚厚的银装。不到八时,在周恩来的窑洞前已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不少人是赶来送行的。周恩来、邓发、李克农、李涛、罗瑞卿、曾三、童小鹏、龙飞虎、邱南章等与前来送行的人一一道别(秦邦宪、叶剑英从外地直接去西安),由一支红军骑兵团担任护送任务。

一匹匹战马踏着崎岖不平的山路,很快在漫天风雪里拉成一条线,向着远方奔去。毛泽东和朱德仍站在原地,一直盯着这支远去的人马渐渐消失了,他们才离去。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朱德说:“恩来此行,任重道远啊!”

延安受阻 绕道而行

延安当时是肤施县城。城内的西北军已经撤走,城里只有一些民团驻防着。从蓝家坪到延安飞机场,如果从延安城内通过,只有三四里路程,所以当晚代表团就派张子华等人进城找肤施县县长高锦尚交涉,经交涉,高仍拒绝中共代表团进城。这样,只好绕道而行。

清早,雪停了,但天气仍然阴沉沉的,寒

风刺骨。代表团的队伍踏上了清凉山的小路,向着延安的南部方向走去。这一段山路又陡又滑,人们只能牵着马徒步攀登。代表团由城外西山绕到城南的杜甫川,由杜甫川到了二十里堡,又由二十里堡终于胜利地到达了延安机场。

中共代表团到达机场时,张学良派来的专机已在这里等候了两个小时。当时全国有专机的只有蒋介石和张学良两个人。机场上,一位穿着校官军服、风度不凡的青年军官,正在焦急地张望着。当他看到大队人马到来时,立即迎上前去。他不是别人,正是张学良派来专程迎接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团的刘鼎。

刘鼎于1924年赴德国勤工俭学,经孙炳文、朱德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6年3月,他应张学良将军的邀请,经宋庆龄介绍从上海到达西安。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让刘鼎随同他到肤施(延安),参加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会谈。参加这次会谈的只有张学良、王以哲、刘鼎、周恩来、李克农5人。会谈后张、周两人都很满意,都非常钦佩对方,有相见恨晚之感。会谈后,刘鼎被中央任命为中央驻东北军代表。对外的公开身份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代表和张学良将军的秘书。

这次在机场,刘鼎见了周恩来非常高兴,他说昨天飞机来了一次,没有接到又飞回西安去了,张学良将军要我们今天再来接。周恩来对张将军的好意表示感谢,并同美籍驾驶员握手致谢。由于飞机座位有限,所以周恩来指定邓发、李克农、罗瑞卿、杜里卿、张子华、童小鹏、邱南章等人随他登机,其他吴德峰、曾三等人留下来等飞机来接秦邦宪、叶剑英

时再去。飞机起飞时已是下午 4 点钟了,天上还飘着雪花。

古城西安 一片沸腾

张、杨“兵谏”的消息,迅速传遍古城。整个西安沸腾了。各界群众纷纷走向街头,成群结队举行游行示威,高呼“拥护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爱国行动!”“拥护‘八项主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

这时西安古城,笼罩着一派战争气氛,南京政府多数人估计蒋介石没有生还的希望,亲日派跃跃欲试,西安局势处于一种紧张动荡之中。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从陕北赶来了。

周恩来等人乘坐的飞机,到达西安机场的时候,天已近黄昏了。刘鼎先安排周恩来等人在北新街七贤庄一号休息。周恩来一直是蓄着胡须的,从保安出发时来不及刮脸就匆匆上路了。来到西安,要接触各界人士,留着长须不便,他下决心把它剃掉,但在七贤庄一号却找不到一把剪子和剃刀。正在着急之时,刘鼎忽然想起安装电台的我党地下工作者涂作潮家中有,于是刘鼎便陪着周恩来坐车到涂作潮家中去,才把胡须剃掉。

刘鼎根据张学良的意见,安排周恩来一行人住进了张学良的公馆。

张学良与周恩来两人重逢格外高兴,当张学良看到周恩来没有了胡须,就非常惊奇地问:“哟,你的美髯呢?”周恩来答道:“刚刚剃掉了。”张学良说:“那样长的美髯剪掉太可惜了”。当晚张学良在公馆的中楼设宴招待中共代表团和随行人员。宴会后,张学良与周恩来进行了长谈。

中共代表团的内部分工是:周恩来自己侧重于政治方面,负责上层统战和群众团体的工作;叶剑英主要负责军事工作;秦邦宪则侧重党组织内部工作以及群众工作;李克农作为代表团的秘书长,统管代表团内部的事务工作。

“三位一体” 力挽狂澜

在第二天(12月18日),周恩来就到止园杨公馆拜会了杨虎城将军,双方进行了交谈。随即在张公馆的中楼,举行了以东北军张学良、十七路军杨虎城、中共周恩来为代表的三方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充分肯定了张、杨的爱国热情,并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战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三方在政策上取得了一致意见,达成了共识,被称为“三位一体”。周恩来还特别强调,“三位一体”,将是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坚。“三位一体”的紧密团结极其重要。如南京方面挑动内战,我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中共都信守三方协议,联合抗击南京政府亲日派对西安的“讨伐”。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一行飞抵西安。第二天“三位一体”与宋美龄、宋子文(代表蒋介石)在张公馆中楼,进行了谈判。由宋氏兄妹代表蒋介石在一份保证文件上签了字。在这份保证文件中,蒋介石同意:(一)宣布并开始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二)停止进

●历代名人与西安●

攻中国共产党；(三) 容纳共产党共同抗日；(四) 把亲日派官员从国民政府中请出去。蒋介石的顾问、美籍澳大利亚人端纳，作为“见证人”，也在文件上签了字。但蒋介石却不同意签字保证，只答应以“领袖人格作保”，回南京后逐步执行谈判协议。

12月24日下午，周恩来与秦邦宪等在张公馆东楼上谈话，忽然传来飞机声，周恩来恍然大悟，连说“糟了，糟了，蒋介石走了”。于是他急速赶往机场，但到达时早已人去机空。周恩来叹息说：“唉！张汉卿就是看旧戏看坏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

由于我代表团执行了党的正确方针，经过努力终于使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六项条件。尽管蒋介石背信弃义，一到南京，就囚禁了张学良，随之又迫害了杨虎城，但是，“西安事变”终于成为我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西安红军联络处

在西安七贤庄一号，有一家德国医师海伯特开设的牙科诊所，它名义上是医院，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地下联络站。

为了解决陕北红军卫生器材和药品供应奇缺的问题，上级指示各地党的地下人员都要秘密购买各种药品和卫生器材。为能将这些分散的医药物资集中起来转送到陕北苏区，必须选择一个适当的地点和收货人。从地理位置上看，西安是最理想的接收和转运地点。但收货人呢？依靠公开的朋友不行，会使对方受到牵连并遭到敌人的破坏。最妥当的办法，是组织自己的秘密机关。几经磋商，最

后确定由美国朋友史沫特莱介绍给刘鼎的德国朋友海伯特作为掩护人。海伯特是德国共产党党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被希特勒驱逐出境。后受德国共产党的派遣到中国的上海帮助我地下党工作。当他听史沫特莱讲要他为陕北苏区转运医药物资进行掩护，非常高兴，当场就满口答应下来了。刘鼎就在西安东城中国银行盖的七贤庄住宅区租了七贤庄一号一个两进的四合院，作为党的地下秘密交通站。他从上海请来的海伯特在前院开了一个“德国牙医博士海伯特诊所”，在西面的正厅摆设着治牙的器械和药品。对外又称是张学良的牙医，也给国民党官员和官太太们看牙。东厅则是一个烈士的遗孀作为“二房东”住在那里，负责接待党的地下来往人员。后院则全部是联络站办公及秘密客人住宿的地方。于是，1936年夏天，一家“德国医师海伯特牙科诊所”就在西安市的七贤庄一号“开张营业”了。

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前，由这家牙科诊所作掩护，接收和运转了大批卫生器材和药品到陕北苏区，同时，还转送了一大批干部到陕北以及全国各地。例如，我国著名作家丁玲、美籍著名记者斯诺到陕北苏区去，就是通过这里护送过去的。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在地下室还安装了一个功率较大的电台，专门转播新华社新闻，对全国各地收听新华社的广播，收听红色中国的声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可惜这位国际友人海伯特，在发生西安事变的早上，听到枪声往门外看时，被流弹打中后牺牲了。刘鼎为失去了海伯特非常痛心和惋惜，亲自为他安葬，并立了碑，让中国人

民永远记住这位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海伯特。

中共代表团在与张学良、杨虎城以及蒋介石的谈判中，工作极为紧张，为了及时向党中央通报情况，所以西安与保安的电报往来也极为频繁。因此，曾三在七贤庄住下后，就和童小鹏等一起投入了繁忙的报务工作之中。

1937年2月，中共代表团从张学良公馆搬到了七贤庄一号，周恩来当时就向国民党在西安的代理人顾祝同提出要在西安建立红军联络处，顾祝同答应了，但又怕共产党的影

响扩大，说周恩来和工作人员可以公开活动，但不能公开挂牌。“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西安红军联络处也就随之改为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并公开挂牌。西安红军联络处，从建立到改名前后，只不过7个月，但它是延安和红军总部通往国民党地区去的窗口和交通总站。

这年4月，春暖花开。曾三、童小鹏等圆满完成了解决“西安事变”问题的通讯联络任务，与周恩来等一起胜利返回延安。

· 解字 ·

“几”

①

②

③

这是“怎耐几番风寒”中的“几”字，读作 Jǐ，是个象形字。①是小篆的形体，像短而小的桌形，可以坐、卧、靠或放置东西，~器多用。②是竹简文的形体。③是楷书的形体，与小篆相似。

《说文》：“几，踞几也。象形。”许说正确。据《周礼·春官》记载，上古有“五几：玉几、雕几、彤几、漆几、素几。”（《孟子·公孙丑》：“隐几而卧。”即伏在几上睡觉。今北方仍有炕几、桌几的用具。

在古代典籍中，常见“几杖”一词，那是指几案和手杖，主要是供老年人平时靠身和走路时扶持之用，所以古以赐几杖为敬老之礼，如《史记·孝文纪》：“吴王诈病不朝，就赐几杖。”

另外，“几”字还能读作 Jī。“几几”为“弯曲”义，如《诗经·豳风·狼跋》：“公孙硕肤，赤舄(xì，以金为饰的鞋)几几。”大意是：公子王孙体肥胖，红鞋弯弯真漂亮。

“几”与“畿”本为含义不同的两个字。“几”为“细微”、“庶几”等义，多作疑问词，用来询问数目，如《孟子·离娄》：“子来几日矣？”现在“畿”借“几”作简化字，应读为 Jī。

“几”是个部首字。在汉字中，有些字的结构中含有“几”的部分而又难以归部，就归入“几”部了。如《康熙字典》中的凡、凯、凭等字，《新华字典》中的风、夙、夙、鳧等字。



地方志

华夏文化的根脉

◎ 梅 森

西汉以来绵延至今的一种文化现象——持续不断地编修地方志,2500 多年来,虽历经战乱、天灾、人祸,但方志代代编纂从未间断,成为世界文明独有的文化现象。清代《四库全书》著录和存目经史子集 17.8 万卷,其中方志是史部的 4.41 倍。1985 年北京天文台主编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收入我国现有旧方志 8264 种、12.32 万卷。方志所记内容的广泛性和记述的多样性,任何典籍只能望其项背。而且其独有性、传承性、广博性、地域性、海量性,笔者也认为无文献可比。志书记载中华民族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史事浩瀚如大海,连绵似江河,先人的足迹可以从中寻

觅,中华民族的文明可以从中继承,先辈的道德精神可以从中得到崇尚。文化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血脉,越是古老的文化传统,这血脉中的凝聚力才越强大,才会包容、融合任何外来文化。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情感的载体、民族特征的直接表现、民族凝聚力之所在。一个民族有信仰才有凝聚力,文化是渗透到一个民族骨髓里的根。可见,地方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笔者称其为“华夏文脉”,“民族文化之根”。

一、地方志在国史、谱牒间具有衔接的重要地位,是中华民族独有的历史文化,是传承华夏文明的重要载体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历史传统,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的载体之一。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三者记载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成为凝结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方志与史及谱牒相比,数量又大大超出后二者,此外,地方志又介于史与谱牒之间,据其冲要。清代章学诚说过:“且谱牒之书,藏之于家,易于散乱;尽入国史,又惧繁多。是则方州之志,考定成编,可以领诸家之总,而备国史之要删,亦载笔之不可不知所务者也。”就是说,方志既可以收谱牒之精华,也可以删自身之精要成为编修国史的重要资料来源,使中华史学文化形成完整的体系。

我国历史悠久,史籍丰富,地方志就是其中的文化宝库,历代保存下来的旧志书仅宋元以来就有 9000 余种、10 多万卷,约占我国现存古籍的 1/1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编纂的省、市、县三级志书就有 6000 多部,总字数在 50 亿字以上。另外,将西方舶来的年鉴改造为以区域性综合年鉴为主体的各省、市、县综合年鉴,增加了中国元素,并纳入地方志的范畴,使今天中国的历史文化主要包含国史、方志、年鉴、谱牒四种。据华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年鉴概览》调查,全国出版的各种年鉴已达 2487 种,每年定期出版的年鉴超过千种,成为当今世界出版年鉴种类最多的国家。所以,地方志在中国历史文化所发挥的作用中日益凸显。历史只有社会内容,而方志不但有社会内容,还有大量的气候、自然灾害、矿藏、植被、水文、环境等方面的珍贵资料,自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大量资料,为历代所用。所以,历代均认为地方志具有“资治、

存史、教化”的功能。明清以来,许多学者利用方志资料从事民俗学、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社会文化、社会政治等研究,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如顾炎武利用大量方志资料写出《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编出《中国地震资料汇编》,著名地理学家、气象学家竺可桢编出《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地质学家章鸿钊编出《古矿录》等等。近 20 多年来,志书为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申报联合国遗产(历史遗产、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论证行政区划变更,大型项目立项,宣传介绍地情,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素材等等,提供大量重要资料。英国学者李约瑟评论中国地方志说:“在中国出现的一系列地方志,无论从它们的广度来看,还是从它们的有系统的全面性方面来看,都是任何国家的同等文献所不能比拟的。”利用地方志进行社会科学研究也同样引起国外汉学家的重视。进入知识经济信息时代,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地方志已经成为全人类的文化资源。陈桥驿著文称:不少外国汉学家把中国历史上积累的方志称为“资源”,认为中国自古以来修纂而成的大量方志是一种价值连城的文化资源,是国外汉学家从事汉学研究的重要工具。近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地方志还为发展各地旅游事业和繁荣文艺创作提供丰富的材料。

著名作家茅盾担任文化部长时,曾建议从地方志中汇编名胜古迹资料,为发展旅游事业服务。他说:“我国地方志书,源远流长,种类繁多,志书搜罗材料之广博,超过正史、野史、前人笔记之所记载,似可组织人力,即

●学术交流●

以地方志中适合于旅游者之多方面兴趣而引人入胜者,编写导游指南。”另外,地方志在文学艺术创作,尤其是历史小说、剧本等方面,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地方志中丰富多彩的地情资料,可以促进文学艺术创作更加贴近生活,更富有感染力。如姚雪垠1957年动笔创作历时30余年,获得茅盾文学奖和日本文部省、外务省颁发的文化奖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根据公刘的长诗改编的电影剧本《阿诗玛》于1982年获西班牙桑坦德第一届国际音乐最佳舞蹈片奖、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音乐歌舞片,都查阅和参考过大量地方志书。2004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青年作家聂浩源(笔名)的长篇小说《峨眉剑雄》,许多内容取材于《峨眉县志》《青神县志》《犍为县志》及《乐山市市中区志》,从中查阅了许多人文地理风土人情等史料,并从乐山市的一批作者所著的地情著述中找到了一些生动形象的描写细节。地方志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其价值不胜枚举,无需赘言。人类只有继承历史文化遗产才能不断进步,地方志就是中华民族必须继承并发扬光大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之一。

二、地域总汇为一国之大统,地方文化总汇为民族文化之集成

元朝,我国多民族国家体制进一步确立、完善,一统志的创立反映了中国人的大一统观念愈来愈鲜明。元朝国土超过汉唐,地方行政部门与今日相似,行省名称的确立就是从元朝开始的。为了统治庞大的封建帝国,元世祖忽必烈采纳大臣提出的“宜为书明一统”的建议,遂命扎马拉鼎、虞应龙等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编成《大一统志》755卷。其实,一

统志虽是中央组织编纂,但其内容是汇各政区地方志以集成。正是因为方志“笼天地于形内,揽百业于笔端”,所以对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古今方志都是组织中央以下地方政权进行编纂,包括省志、府志、州志、县志、乡镇志,内容涵盖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地情无不囊括其中。编纂地方志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大一统和中华民族地方文化的集成。

两千多年来我国中央政府曾颁发许多修志命令,包括封建社会的35份诏令;民国政府的11份“训令”、“概要”、“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颁布了54份修志命令。尤其是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颁布《地方志工作条例》,其前后各省市人大、政府出台了一批编纂地方志的政策法规。封建社会规定60年一修,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20年一修。可见地方志反映了中央政权的意志,是大一统文化。

三、地方志是中国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人解释:中国社会主义主流文化是五千年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与百年中国革命文化传统的结合。“对于当今的我们来说,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丰富的革命文化,就是我们文化安身立命的根基”。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化和百年革命文化就是我们主流文化的主要内容,二者的融会贯通,就是我们的主流文化。主流文化从层面上说,它不仅是庙堂的,同时也应该是区域的、民间的。比如敦煌莫高窟的造像,唐宋以来,真正能代表中国文化生命力的彩陶、宗教雕塑,诗经、汉魏六朝民间诗,今天所讲的

来自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笔者认为这些同样是主流文化。古今地方志所记载的民族传统文化内容,近百年革命文化内容和近30年改革开放内容,既有中央政府的政治活动,又有地方的文化内容。这就是地方志,我们应该确定,地方志正是传承主流文化、传承传统文化精华的重要文化载体之一。

世界上有众多的民族,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世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鲁迅先生在“欧洲文化中心论”席卷整个中国文化界的时期,就清醒地指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今天,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一体化、科教国际化的进程,我国社会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随着现代化进程、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目前我国大批风情独特的古村落、民居、作坊和其他遗址已经遭到破坏,大批珍贵的无形文化遗产因各种原因失去传承。要实现民族真正的复兴,就必须从自己民族文化里寻求,而不是一味的“拿来主义”。面对各种挑战,正确认识和巩固主流文化已迫在眉睫。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所以他又是世界的,在李约瑟与外国众多汉学家对中国地方志的评价中,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鲁迅先生在70多年前讲这番话的意思。保护与发展地方志就是保护我们的主流文化,保护我们民族的灵魂。

四、社会主义时期的地方志内容贯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锦涛同志指出:“理想信念,是一个政党治国理政的旗帜,是一个民族奋力前行的向导。”“民族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不竭源泉。”地方志是弘扬民族

精神的载体,历朝历代统治阶级都是利用方志来宣传传统文化,宣传中华民族的理想道德,只是社会本质不同,宣传的内容不同,但宣扬传统美德、爱国爱乡、自强不息、守望相助等民族伦理是一以贯之的。只是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传统民族的道德理念中融入新时代社会主义的理想与情操,建设的是与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建立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之上,融人民族传统文化之中。可见,地方志这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数千年都在宣扬传统美德,今天又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精神,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的精神传统编纂于其中。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体现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历史文献。目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改革和建设过程中,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包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现象,部分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观念淡薄。所以,在当今情况下,进一步发挥地方志的功能,开展读志用志,在志书中宣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文明相结合的核心价值观内容,是具有重要作用的。地方志是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文化载体。

综上所述,地方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绵延2500多年。它传承历史文明,科学地认识地情,为百业保存文化遗产,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决策提供依据,为教育大众提供爱国爱乡优良传统的教材,是游子包括海外华侨的心理文化之根。用今天的意识形态看,地方志又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融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文化载体。统而言之:地方志是华夏文化的根,传承文明的脉。

挚友内山完造忆鲁迅

1936年10月19日，文学家鲁迅在上海病逝。76年后的今天，内山完造回忆挚友的《我的朋友鲁迅》面世，首次重现那段尘封往事。

“如果说内山完造先生眼中笔下的鲁迅和我们认知的有所不同，关键在于他认识的鲁迅登场时只是个书店的顾客，而我们知道的鲁迅是印在课本里的骨头。”在《我的朋友鲁迅》一书的序言中，著名主持人、策划人崔永元开篇便这样写道。

对于鲁迅，在学术研究和民间认知上似乎存在一个断层。鲁迅研究的资料浩如烟海，普通民众尤其青年人却对他知之甚少甚至敬而远之，伟大的鲁迅却并不可亲。而这一次，这本并不学术的《我的朋友鲁迅》，带来一个从人间烟火中走出的鲁迅。

《我的朋友鲁迅》中所辑录的45篇文章，大多来自于民国时期的中文、日文报纸和杂志，其次是内山完造在日本出版的个人回忆录、随笔集。时隔多年，这些报纸刊物基本都已停刊、在历史中灰飞烟灭，而内山完造的著作除《活中国的姿态》《上海下海》，其余均未在国内出版。如今，这些尘封已久的文章得以首次与国内读者见面。

在这些文笔质朴的散文中，鲁迅的影子



逐渐清晰起来。他讨厌蚊子，是一位慈爱的父亲，平日里喜欢哈哈大笑。他喜欢每天去内山书店坐一会儿，且最喜欢被客人误认为店主，有些孩子气的顽皮。而同时，他的日常言行中也从不掩饰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悲观和忧虑，经常慨叹“中国这样下去，会变成和阿拉伯一样的沙漠啊”。

可能因为这样矛盾的，却具有亲和力的鲁迅实在不常见，这本书才得到了崔永元、易中天、止庵、陈平原、蒋方舟的一致推荐，其中崔永元更是慨然写下了长序《又见鲁迅》。书还未上市时，已有不少媒体表示感兴趣。韩寒主办的电子期刊《一个》的编辑团队在试阅部分之后，惊喜地说：“很有意思，鲁迅变成一个趣味盎然的活人了”，并表示将在《一个》中选

载书中部分内容。而本书推荐人之一止庵，作为国内周作人研究专家，也表示其中一些史料连他也未曾见过。而由于内山的平实文笔和视角，这本书也是让大众读者贴近鲁迅的一个很好的媒介。

鲁迅讨厌日本政府却不讨厌日本人？

内山完造一直以“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以及“鲁迅的朋友”的身份为人所知。他曾出现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语文课本中，在作家阿累回忆鲁迅的短文《一面》中一闪而过。而近几年，他与鲁迅的关系却有了争议。“内山其实是日本间谍，鲁迅就是被他害死的。”甚至有人质疑鲁迅和内山熟识，他也与“间谍”脱不了干系。事实上，内山完造曾经数次冒着生命危险为躲避国民党追杀的鲁迅及家人提供庇护所，而因为他与中国左翼作家的过从甚密，反而曾经被自己的祖国日本指责为“卖国贼”。

鲁迅曾半戏谑半讽刺地问内山：“你猜孔圣人要是今天还在世的话，他是亲日派，还是反日派？”在《伪自由书》后记中，他就曾提到两篇他人披马甲所写，攻击内山是间谍的文章，毫不客气地怒斥“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作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是，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习的！”

根据内山的观察，鲁迅虽然讨厌日本政府，对普通日本人却比较友善，他认为日本人的“认真”这一优点，是无论中国人再讨厌日本人也要学习的。但他也明白“今天就算我喊

破喉咙，怕是也没有谁会听我的，相反会被扣上类似‘卖国贼’‘帝国主义走狗’之类的帽子被人追杀吧。”

鲁迅的最后一句话“我的病怎么样了？”

“我的病怎么样了？”这是内山完造记忆中鲁迅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1936年10月18日早上6点左右，他收到了许广平捎来的鲁迅最后一封信，尽管笔触凌乱，仍然格式准确文雅，称呼用了敬语。此时距离鲁迅去世已不到二十四小时，他仍然记得写这封信通知内山：因病情加重，今日无法赴约了。并请内山转达须藤医生“请他速来看一下”。

除还原了不少鲁迅日常生活中的言行细节，《我的朋友鲁迅》也从一个全然不同的角度写到了鲁迅去世前后的一些细节。此前，在鲁迅遗孀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和儿子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曾有一些相关记述，其中，《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曾记录下了鲁迅家人对于主治医生须藤是否误诊导致鲁迅病情延误的疑问。

鲁迅最后被确诊为肺结核、肋膜炎，病重不治身亡。从内山的记述中，须藤医生最后说鲁迅的病情已从“哮喘转向了心脏性哮喘”，这似乎与之前美国肺病专家邓恩对鲁迅做出的诊断（结核性肋膜炎）不符，留下了新的疑问。鲁迅去世前十分痛苦，已经到了呼吸困难的地步，不得不通过打止痛针来缓解。从10月18日到19日凌晨，不到一天时间内，他的病情迅速恶化，从勉强能够说话到停止呼吸，死神这次以令人心碎的速度夺去了这位文学巨匠，以及思想上的巨人的肉体和精神。

在写给鲁迅的另一位日本友人增田涉的

西安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孙长兴

孙长兴(1918~1993),男,汉族,江苏省灌云县人。1918年4月出生,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4月入党。抗日战争时期,任灌云县游击队队长,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三团八连排长、副政治指导员,八路军第五纵队三支队八团警卫连政治指导员,新四军第四师九旅二十五团八连政治指导员,旅政治部保卫科干事、特派员,第九旅二十七团政治处保卫股股长、营政治教导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第

二纵队政治部保卫科科长,第一八八团政治处主任。建国后长期从事部队政治工作,1968年3月,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21军政治部主任的孙长兴受命担任西安市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后改称中共西安市革委会核心小组)组长,5月市革委会正式成立,孙长兴任主任。1971年5月任中共西安市委第一书记。1975年12月奉命回部队工作。1985年1月离职休养。1993去世。

信中,内山记录道,在22日的出殡仪式上,有6000多位青年主动来送行,全国各大报纸都以“文星陨落”“巨星陨落”这样的标题刊登了鲁迅逝世的消息。由蔡元培、沈钧儒、胡适、宋庆龄、内山完造等人组成的8人治丧委员会,主持完成了这场特殊的葬礼。

“没有一个僧人、道士或是牧师,全是鲁迅先生的朋友,真痛快。”

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在鲁迅去世前后,周作人似乎都并未露面,至少内山没有记录下他的出现,不知这两兄弟之间的恩怨,是否连死亡也无法将其化解呢?

另一个细节是,在鲁迅逝世仅仅6年后,日本宪兵队突然地逮捕了许广平,理由是她持有一份“共产党员的花名册”,并将她关押在了当时臭名昭著的“人类屠场”极司菲尔路

“七十六号”,内山详细地记述了从这一事件发生到他从中斡旋,营救许广平的全过程。

在鲁迅去世之后的漫长岁月里,内山时不时会想起这位老朋友,并写下点什么。在这些岁月里,他也见证了中国的变化和中国民众对于鲁迅的怀念。令他欣慰的是,他们似乎并未忘记这位曾经影响了几个时代,乃至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巨人。

正如他曾在鲁迅葬礼致辞中所期望的一样: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每当我想起这句话,都仿佛看到只身行走在茫茫旷野中的先生孤单落寞的身影。”

“我希望在座的各位,不要让先生的足迹被杂草覆盖。更希望大家追随先生的脚步,走出一条光明大道来!”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 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13人出席会议,代表全国50余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参加会议。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产生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从此中国出现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代中国社会及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为之一新了。

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毛泽东后来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

密进行的,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却已在沉沉黑夜中点燃起来。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正是这个党,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初走上中国政治舞台,是中国社会和革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1840年鸦片战争后,为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政党不能承担起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要解决中国发展进步问题,必须找到能够指导中国人民革命的先进理论,必须找到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

●史料钩沉●

革的先进社会力量。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伟大使命,历史地落到了刚刚诞生的、只有五十多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身上。

李达:上海代表,一大召开前负责组织联络和后勤保障工作。主持创办中共第一个秘密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和革命丛书。创办上海平民女校,任校长。1922年7月出席党的二大。同年11月赴长沙,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并主编校刊《新时代》。1923年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与陈独秀发生意见分歧,随后离开党组织。此后从事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政法大学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66年8月24日在武汉含冤去世,终年76岁。1980年得到平反昭雪。

李汉俊:上海代表,参与一大的筹备工作。一大上海会址便是他兄长李书城的家。1922年因与陈独秀、张国焘发生意见分歧,离开上海到武汉,在武昌中华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自动脱离了党组织,但仍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活动。同年10月任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执行委员、教育主任委员。1923年2月参加京汉铁路总同盟大罢工。同年6月在没有出席党的三大的情况下仍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24年中共中央鉴于他自动脱党,正式开除其党籍。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等职,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

动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大革命失败后,愤怒声讨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行径,并掩护了大批共产党员。1927年被桂系军阀杀害,终年37岁。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张国焘:北京代表。一大后,又连续出席了党的二大至六大,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1931年回国,被派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1932年10月至12月,带领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进入川北,与川陕边党组织创建川陕根据地,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担任红军总政治委员。随后,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并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继而另立“党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与红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到达陕北。虽然党中央批判了他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但为了教育和挽救他,仍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1938年4月初,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靠国民党。同年4月18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不久,加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组织,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新中国成立前随蒋介石逃往台湾。1949年转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1979年病故于加拿大一养老院,时年82岁。

刘仁静:北京代表,是参加一大年龄最小(当年19岁)的代表。1922年赴苏参加共产国际四大。1923年回国,参加党的三大。同年参

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被选入团中央领导机构。1926年起赴苏学习。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1929年又私访被流放在土耳其的托洛茨基。回国后因积极参加托派活动，被开除出党。1935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7年出狱，赞成国共合作抗日。抗战胜利后，认为中国有和平发展机会，反对进行解放战争，发表过批评中国共产党革命路线的文章。1950年在《人民日报》发表公开声明，检讨自己的错误，表示诚心拥护中国共产党。此后，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政治经济学，曾任国务院参事。张国焘去世后，他成了唯一健在的一大代表。1987年8月，在北京北太平庄附近过马路时，被一辆行驶很快的公交车撞上，不治身亡，终年85岁。

毛泽东：湖南代表。在党的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成员。1927年9月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创建中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和工农革命军。1931年11月起，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上确立了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1943年3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从七届一中全会起至1976年逝世，一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主席。1949年9月，主持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1976年9月9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3岁。

何叔衡：湖南代表，是参加一大年龄最大的代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参加湖南省党

部改组工作，曾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监察委员。1927年长沙马日事变后，秘密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8年6月赴苏，出席党的六大。同年9月，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1930年回国后，在上海担任共产国际救济总会和全国互济会的主要负责人。1931年，奉命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内务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北上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2月，在转移途中被敌人包围，突围时在福建长汀牺牲，终年58岁。

董必武：湖北代表。党的一大后，回武汉建立和发展湖北的党组织。1926年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7年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常委兼农工厅厅长。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赴苏，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2年回国后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临时最高法庭主任。同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共中央西北局党务委员会主任。1937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代主席。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被中共中央派到国民党统治区的武汉、重庆，参与领导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项工作。1944年11月回延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



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1975年4月2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9岁。

陈潭秋：湖北代表。1923年2月，参与领导京汉铁路江岸地区工人大罢工。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任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部长。1927年5月，在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大革命失败后，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等职。1930年9月，在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同年12月在哈尔滨被捕。1932年7月经党组织营救获释后回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1933年赴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34年2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粮食人民委员。同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央分局委员。1935年7月去上海治伤，曾参与指导左联的工作。后赴苏联学习，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1939年5月回国，

化名徐杰，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新疆办事处主任。1942年9月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杀害，终年47岁。牺牲后因消息隔绝，在党的七大上仍被选为中央委员。

王尽美：山东代表。1922年到上海参加党的二大，会后被留在中央负责领导工人运动。参与制定《劳动法大纲》，先后领导山海关、秦皇岛等地工人罢工斗争，并为开滦五矿总同盟罢工指挥部成员之一。1922年11月，在山海关领导建立党组织。1923年2月，被反动当局逮捕，经工人营救获释。后重回山东，主持山东党的全面工作。1925年1月，出席党的四大。同年2月，抱病组织青岛国民会议促进会，参与领导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因长期积劳成疾，于1925年8月19日在青岛病逝，终年27岁。

邓恩铭：山东代表。党的一大后，回济南建立中共山东区支部，任支部委员。同年，参加发起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底赴青岛，创建党组织，先后任中共直属青岛支部书记、中共青岛市委书记。1925年，领导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和青岛全市工人大罢工，组织成立青岛市各界联合会和市总工会。同年8月，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927年出席党的五大。回山东后，任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1928年春，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后调回省委，被派到淄博矿区负责党的工作。同年12月，在济南被捕。1931年4月5日英勇就义，终年31岁。

陈公博：广东代表。1922年自行宣布脱离共产党，赴美国留学，后被开除党籍。192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撰写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对党的一大召开日期的考

证及对一大党纲、决议等相关文献的披露,对一大和中共早期历史研究有较大参考价值。1925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38年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同年12月随汪精卫叛国投敌。1944年11月就任伪行政院院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逃往日本,后被押解回国。1946年4月被国民党高等法院判处死刑,6月在苏州被处决,时年56岁。

周佛海:旅日代表。抗日战争时期卖身投靠日本充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1946年被国民党高等法院判处死刑。1947年3月蒋介石下特赦令,改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因心脏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时年51岁。

包惠僧:由陈独秀指定出席党的一大。1922年至1923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兼秘书、中共武汉区委委员长。1924年国共合作建立后,曾任铁甲车总队政治教官、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等职。1927年1月调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夏斗寅叛变后一度被夏扣留,后回武汉。大革命失败后脱党。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安排下,任国务院参事。撰写了近百万字的回忆录,有很高的史料价值。1979年7月2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5岁。

除以上13位代表外,还有两位参会的共产国际代表。

马林:原名亨德里克斯·斯内夫利特,在华化名孙铎。马林是其俄文译名的中译名。荷兰人。在荷兰荷京大学修完政治经济学课程后,投身于荷兰工人革命运动,担任港运秘书。1900年到铁路部门工作。1902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工党。1913年前往荷兰殖民地爪哇,

1914年在爪哇建立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前身)。1920年6月作为东印度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到苏俄参加共产国际二大,任殖民地事务委员会秘书。会后受列宁委派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到中国协助建立共产党。1922年至1923年三次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汇报工作,随后被共产国际任命为远东局负责人之一。后回国,在荷兰码头工会担任秘书。1927年脱离荷兰共产党。1929年建立托派组织——革命社会党,1938年拒绝参加托派的“第四国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了荷兰的抵抗运动,后被德国法西斯逮捕,于1942年4月被杀害,终年59岁。

尼克尔斯基:俄国人。1919年至1920年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工作。1921年加入俄共(布),并参加共产国际机关行政处工作。同年6月,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委派,来中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1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随后又转到中国东北工作。1926年回国,先后在哈巴罗夫斯克、赤塔等地工作。1938年因涉嫌托洛茨基派被捕。1943年遭到错杀,终年45岁。后被平反。

时代骄子,风云际会。十几个人,相聚上海,完成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使命。大浪淘沙,岁月无情。还是这十几个人,后来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路,有着迥然不同的人生归宿。毕生为党的事业奋斗者有之,为人民解放而献身者有之,中途脱党者有之,背叛革命者有之,沦为汉奸者有之。他们的曲折经历,尽现复杂离奇的社会变迁,折射出剧烈动荡的时代特点,也让后人留下对人生深深的感慨和思考。



《白鹿原》白灵原型 张景文人生传奇

陈忠实的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白鹿原》，塑造了无数生动活泼的人物，白灵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白灵——个性鲜明的女革命者

在小说《白鹿原》中，白灵出生时百灵鸟在白家庭院里鸣叫，而远方的辛亥革命正打响第一枪。她一出生，眼睛里有某种天然的凛凛傲气。这股傲气使得白灵与白鹿原上所有女性应有的品行划清了界限，让白灵拥有了一段轰轰烈烈而又极富激情的短暂生命。

小说中，白灵与白鹿原上坚持儒家文化传播的朱先生和白嘉轩不同，她是白鹿原上心地最纯良的革命者。她在私塾发蒙后就以死相逼，早早离家到省城接受新式教育，大革命时组织学生搬运死尸，砸穿院墙逃婚，一封

信闹得未婚夫家鸡犬不宁。在国共反目，反动政府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时，她加入了共产党，一砖头砸断陶部长的鼻梁，被人称为“关中冷娃”。临死时，她大骂残害革命青年的毕政委是“一个纯粹的蠢货，一个穷凶极恶的无赖，一个狗屁不通的混蛋”。

作为小说《白鹿原》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陈忠实笔下，白灵是白鹿原上的精灵，是族长白嘉轩最疼爱的女儿，拥有一段轰轰烈烈而又极富激情的短暂生命。

根据蓝田县志主编卞寿堂先生的考证，白灵的真实原型是一位名叫张景文的革命烈士。

小说《白鹿原》中的白灵是一个怎样的女性形象？她的原型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这个由大地主、国民党、共产党组成的家庭，对这个“叛逆”女儿的革命活动态度如何？这个家

庭的最终命运如何？

身世——生于富裕地主家庭的刚烈女娃

据张景文唯一在世的亲人——侄女张菊惠回忆，张景文，乳名张秀云，是白鹿原东南部的蓝田县安村乡宋家嘴村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那年，张景文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张家在白鹿原上有良田百亩，张景文的父亲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新派地主。与小说中情节不同的是，张景文是被父亲主动送到陕西教会学校读书的。父亲的疼爱和张家在当地的势力，让张景文从小就养成了敢说敢干的直率刚烈性格。张景文在乡间，经常把家里的白馍拿出来送给吃不上饭的穷孩子和讨饭的人。有一年临过年，她自作主张把家里刚蒸的包子拿了许多分送给穷人，父亲斥责她时，她说：“哪怕我不吃，也不能眼看着这些人受饿。”有一次，村里来了一个小商贩，存心欺哄一个不识数的农妇，在一旁的张景文二话不说，上去就踢翻了商贩的担子，折断了秤杆。村里人都说，这女娃将来一定是个当大材料的人物。

进步——在白色恐怖时期入党

1928年，张景文考入陕西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思想更趋进步。这时正是大革命失败后西安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的时期，西安当局追随蒋介石，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挥起了屠刀，大批革命志士和共产党员被活埋、枪杀。这就是《白鹿原》中描述的，大批共产党人被投入枯井的时期。

在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下，大批共产党员被杀或失踪，也有的远逃他乡，脱离了党组织。在人们谈“共”色变时，早就有进步倾向的张景文却不惧白色恐怖，勇敢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31年7月，共产党员张景文受中共陕西省委委派，冒着生命危险回蓝田传达省委指示，建立地下党组织。

扬名——组织学生运动，带头打戴季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西安地区的爱国青年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各中等学校迅速建立起以党团员为骨干的抗日救国会。张景文当时是女子师范团组织和学生会的负责人，《白鹿原》中记述有白灵和西安学生痛打陶部长（戴季陶）的一段故事，张景文就是这次学生革命行动中的骨干之一。

1932年4月，当时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打着视察西北的幌子来到西安，实际上是奉蒋介石的旨意来兜售“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压制西安地区革命群众的抗日高潮。为了拍长官的马屁，陕西省教育厅决定在民乐园礼堂召开各校学生代表参加的欢迎戴季陶大会。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西安高中、西安女师及其他学校的党团组织，及时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

4月25日，各校师生大约有两千人到会。台上戴季陶喋喋不休地进行反共媚外的演讲，台下张景文等学生纷纷递上条子提出质问，戴季陶支吾搪塞，更加激起学生的愤慨，现场响起一片高呼“打倒顽固派，打倒戴季

●史料钩沉●

陶”的口号声。张景文首先响亮地喊了一声“打”，同学们把早已准备好的石头、砖块、瓦片扔向戴季陶。戴季陶衣服被扯烂，在军警的保护下狼狈而逃，愤怒的学生又烧毁了戴季陶的汽车。

第二天，西安各界学生发起了“驱陶”游行大会，女师学生在张景文的带领下，同前来镇压的反动军警展开搏斗。张景文冲在最前面，最终被捕。

反动当局见张景文只是一个小姑娘，决定单独关押她，张景文却誓死要和其他同学关在一起。由于张景文的父亲是蓝田县有名的地主，哥哥也是国民政府蓝田县的官员，在家族的斡旋下，当局准备先释放张景文，却遭到她的拒绝。最后在地下党组织和社会各界的压力下，张景文与被捕学生终于全部获释。这次事件后，张景文以“第一个出手打戴季陶的女娃”扬名关中，成为西安地区学运领袖。

庇护——以家庭声望为掩护从事地下活动

此后，张景文回到老家，在蓝田县以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活动。据张菊惠回忆，这段时间，在张景文的影响下，张家的女人们全都剪了象征革新的短发，还放了天足。张景文的父兄虽然已经知道了张景文的共产党身份，也知道共产党在当时“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路径，但却无法阻止这个倔强的女儿。张菊惠提到小时候经常听家里的男人们谈论时事，她和奶奶也大约知道张景文在干什么。有一次奶奶抱住张景文的腿不让她出门，直到张景文以死相逼才哭着放开手。

这个由大地主、国民党、共产党组成的家庭当时经过了怎样的激烈争论，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最终的结果是，张家仍然为张景文的地下活动提供庇护，张菊惠的父亲还专门负责帮助张景文藏匿机密文件。张菊惠回忆，老家的阁楼里有一个箱子，父亲曾经警告，里面放的全是姑姑的东西，绝对不许乱动。外地的地下交通员来找张景文时，因为张家在蓝田活跃的社会活动，她也很少受到保安机关的怀疑。

1933年1月，张景文与丈夫徐国连及蓝田地下党负责人白耀亭、林子屏等再次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结果四名教师全部被捕。这一次张景文的地下党员身份公开，家族力量再也不能庇护她了。张景文获释后，与徐国连一起来到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在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工作。

“牺牲”——死于根据地肃反运动

张菊惠退休以后，专程去了一次姑姑张景文工作过的“南梁”，她说去了一次后，想到自己乘车都要颠簸这么久才到，这么辛苦，当年张景文是怎么躲着敌人的搜捕，凭一双脚走过去的。

张景文抵达根据地后，受到了刘志丹、习仲勋等的热烈欢迎。

1934年，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张景文担任苏区政府妇女委员长。为了发展苏区教育事业，苏区政府办起了第一所红色学校“列宁小学”，张景文担任教师。她带领六十多名学生垒土台，支木架，用窑洞当教室，自编教材，以地面当纸，以木棍当笔，出色地开展起

“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

是怎样喊响的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今天看来很平常的口号,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蛇口提出,如一股强烈的冲击波,在当时对国人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它的作者袁庚,蛇口工业区的创始人,在喊出这句口号之时,丝毫不觉得这观念有多么石破天惊,而是再正常不过了。

忆及此处,袁老像个孩子一样得意地笑着:“当时很多人都说我要钱又要命,想想还真是这样。”不过,当时的情形却不是如此轻松。袁老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当时我在香

港花 6180 万港币买了一栋楼,第一次交订金时,出了 2000 万支票。那天是星期五,约好下午两点钟在一个律师楼里交易,我们带着 2000 万的支票去了,卖楼方也有好多人来。楼下几部汽车停在那里,汽车发动机都没有停。上去签完字,对方拿着支票,急急地就下楼去了,只剩一个老板和我们谈善后的事。那张支票却以最快的速度,马上存到银行里去了。因为第二天是礼拜六了,银行要关门,假如礼拜五下午 3 点钟之前不到银行去交那个支票的话,他要损失 3 天的利息,所以他要求我们按

苏区教学工作。刘志丹、习仲勋决定成立一支红色宣传队,由张景文带领宣传新思想、新风貌、新路线,张景文走村串户,写宣传标语,编诗歌,顺口溜,信天游小曲……至今南梁地区的父老乡亲还记着她自编自唱的信天游:“婆姨好放开脚,长发剪成短发益,男当红军女宣传,革命势力大无边……”群众和游击队员都很喜欢她,亲切地称她“张放心”,意思是张景文办事,大家都放心。

1935 年 3 月,张景文的丈夫在一次遭遇战

中不幸牺牲,张景文把仇恨和悲痛埋在心里,继续在反围剿的恶劣环境中坚持斗争。1935 年秋,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在极“左”路线指导下,开始了一场大肃反运动。生平最恨叛徒的张景文也在这时被诬为国民党特务机关派往根据地的“奸细”,死时仅二十四岁。

解放后,蓝田县召开追悼大会,为张景文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这就是《白鹿原》中白嘉轩接到革命烈士牌后,才知道女儿白灵下落的一段史实原貌。

●史料钩沉●

时把支票交给他。当时浮动利息是 14 厘,3 天就是几万元的利息,资本家对这个是如此看重,可是如果换成内地的同志,就无所谓,这个支票就放到家里去了,因为他没有时间就是金钱这个观念!”袁老认为这是香港给他上的第一课,感受尤其强烈,他说:“随便一个香港人都有时间就是金钱的意识,对他们来说,这是大白话。”正因为此,袁庚很自然就喊出了那句振聋发聩的口号。虽然这句口号在社会上引起广泛争议,但让袁庚颇为得意的是,1984 年小平同志来深圳视察工作时对此口号表示肯定。

袁庚在 1978 年被任为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成为招商局第 29 代“掌门人”。袁老回忆说:“我接手招商局的时候,全部的资产加起来只有 1 个亿,2 个修船厂加上一个不到 13 层的旧楼。”袁庚上任伊始即向中央打了报告,不用中央一分钱,只要划块地给招商局,借助内地的人力、土地发展招商局。有了想法,袁庚随即开展调查,调查组从南头半岛一直走到大鹏半岛,最后选在了南头半岛。

1979 年 1 月 31 日,招商局正式进驻蛇口,独立开发和经营蛇口工业区。当年 8 月,蛇口工业区开始建设首个码头,用以接运香港方面的物资。那时龟山和微波山还连在一起,而码头后方需要填充夯实,于是就因地制宜,决定炸开龟山和微波山,用那些土石方填码头后方。

袁庚回忆说,两个工地之间只有 600 多米的距离,可那时吃大锅饭,运送车一天最多只跑十几个来回。为了抢工期,袁庚想出了一个奖励办法,完成定额者每车奖励 2 分钱,超过定额者每车奖励 4 分钱,如此一来,工人们

热情高涨,最多的每天运送 130 多趟,码头因此提前一个月完工,工人们为国家创造的价值多达 130 万元,但工人们拿的奖金不及产值的 2%。

没想到这 4 分钱却惊动了北京,当时有人把蛇口发超额奖金的事捅到交通部,引起轩然大波,被交通部勒令停止执行。据袁庚回忆,后来是新华社的记者就此事写了内参,当时的中央领导看了之后,作了批示,说发奖金的办法可行。至此,蛇口又恢复了定额超产奖励。并在此后的华益铝厂、华美钢厂、南海石油基地等项目实行。

蛇口工业区的成功创办让招商局这个百年老店重焕异彩,及至袁庚 1992 年离休时,招商局资产已达 200 亿,15 年时间资产翻了 200 倍。

“时间就是金钱,速度就是生命”引发和振动了当时人们的时间观念、效率观念,成为“特区速度”的有力佐证。时至今日,这句当年被制成巨型广告牌、矗立在蛇口最显眼之处的深圳口号,已融入国人的坐言起行之中了。



隋唐长安城门趣闻(十)——芳林门

(隋唐长安外郭城北面偏东门,实为禁苑南门之一。遗址在今西安城西北郊星火路中段)

1.徐齐聃芳林门修书

徐齐聃,字将道,祖籍湖州长城(今浙江长兴县东),世代客居冯翊(今陕西大荔县)。少聪敏,八岁能文。唐太宗亲为召试,奖赐其所佩金削刀。高宗时为崇文馆学士,“侍皇太子讲,修书于芳林门”(《新唐书·徐齐聃传》)。

2.中宗入芳林门观游戏

景龙四年(710年)二月庚戌,唐中宗令中书门下供奉官五品以上、文武三品以上并诸学士等,“自芳林门入集于梨园毡场,分朋拔河”为戏,“帝与皇后、公主亲往观之”(《旧唐书·中宗纪》)。

3.芳林门南置新市

隋唐时期,长安禁苑(隋称大兴苑)地域辽阔,东及泾河,北枕渭河,西包汉长安城,南接

都城,东西二十七里,南北二十三里,周一百二十里。苑中除建有多处亭台殿阁与园林池沼以供皇室观景游乐外,还种植有蔬菜林果。这些蔬果主要供应皇室与百官享用,剩余的也曾在禁苑南门芳林门外设市向百姓出售。《唐两京城坊考·禁苑》载:“(宪宗)元和十二年,置新市于芳林门南”。但此出售苑中蔬果的“新市”,终因在都城之北,地处偏远,交易不便,不久就废置了。

长安城中这种向百姓出售苑中蔬果之事早在武则天垂拱三年(687年)四月就曾有过。时尚方监裴匪躬主管京城苑囿,亦曾“将鬻苑中蔬果以收其利”,但当时遭到西京留守苏良嗣的反对,说“未闻万乘之主鬻蔬果也”。此举“乃止”(《资治通鉴》卷二百四)。

·名句欣赏·

【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战国策·秦策一》

使民:统治人民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诗经·小雅·车辖》

仰:仰望,瞻仰。止:之。景行:大路;一说景行,崇高的德行。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太上:最高,最上。立德:树立德行。立功:建立功业。立言:著书立说。

【妖不胜德,邪不伐正,天之经也】——《潜夫论·巫列》

伐:损害。经:原则。

【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人弥明】——《论衡·书解篇》

弥:越,更加。缛:繁,多彩。彰:明显。



秦岭北麓的泾河水域，是陕西关中地区的一条重要河流，是古时长安八水之一。泾河上游由蓝田县境内的汤峪河和现今长安区东部的库峪河两支河流汇成。然而在库峪河与汤峪河汇集之前，库峪河在长安境内距秦岭八九公里处又汇纳了一支名为清水河的小支流。在库峪河和清水河交汇的三角洲内，距三角又往南两公里，距秦岭约六、七公里处坐落着一座近年来远近闻名，吸引着众多信男善女朝拜的寺庙——亮碑寺。

亮碑寺的地理位置

亮碑寺所在位置为马嘶坡村南部，地处八里塬和少陵塬之间的大峡谷中，即泾河上游靠近八里塬的库峪河西岸的崖边上，与西边靠近少陵塬的清水河相邻一公里处。马嘶坡村，原名为惠氏坡，因为这里全部居住着惠姓的周惠王的后裔们，唐朝时期，太宗皇帝李

世民出城南狩猎，行此处，坐骑突然嘶叫不已，随行宫人回宫记事时，把此处记为马嘶坡。从此惠氏坡更名为马嘶坡。

这里充满着神奇。西边的清水河是条上流隐源的暗流河（俗称渗水河），尽管此河上源紧邻秦岭山脉峪口，河床中却除了沙土淤泥外，找不到一块石头，四季水清透彻，从不干枯。相传“青蛇”曾经在这里修炼，说的是“白蛇”被压在雷峰塔下后，“青蛇”几番解救无果，后返回峨嵋山继续修炼。几年后，因凡心未灭，尘缘未尽，厌倦了清规戒律的生活，便出游。历经三山五岳，来到秦岭北麓，发现清水河地界较为清静，是块好居处，产生栖居之意，便在河西岸的兴龙山滞留了下来。后在此与南方争夺群象首领之战中败北落逃的“白象”相遇，日久生情，结为夫妻，同居青蛇洞，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后产一子名为“遥

遥”。后来因此把兴龙山改为青龙山。民国初期,马嘶坡西社人惠应兰,遇南山熊姓道人指点迷津,在清水河西岸青龙山上挖窑五孔,修建起了“青龙山五云洞”庙宇,在它的紧南边有一洞穴,名“青龙洞”,传说此洞就是“青蛇”居住过的洞府。

亮碑寺庙的东侧,近靠库峪河的岸边,原来有一条下河道的小坡道,是民间过河走亲及下河耕作的道路,2000年,当地居民为加宽坡道,在用推土机取土时,发现一眼小泉溪,水清透彻,往里一直朝西通往亮碑寺庙的底部方向。洞口大小仅能容一人进入,非人工所为。有好奇者相聚执火进入探之,言:往里洞愈小,人不能入,退出。后一日,河对岸有一老妇人,过河赶集,午后返回途中,天热,口干舌燥,有疲惫,走近小溪处,被清澈的溪水吸引,便蹲在溪边洗了把脸,擦了把眼睛,顿觉凉爽,精神倍增。回到家后第二天出现奇迹。此妇人本有眼疾,加上年纪已大,视力一直不好,看东西模糊不清,不料想第二天眼疾好转,视力清晰。邻人问之,竟不知所知。后仔细回忆,觉得与先天赶集路过小溪用水洗漱有关,随告之村人,都觉神奇,也来取水治病。广而传之,一时四乡八邻,来此取水者甚多。小溪洞被称作青龙洞,溪水被誉为龙泉,愈传愈神奇。亮碑寺附近一时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新闻媒体也加入其中进行讨论,还惊动一些企业家,想在此开发龙泉矿泉水。对水质进行了权威化验,据说水中含有不少矿物质。此时村人也知道了此泉的重要性,选出代表谈判,提条件,想以此致富全村。考察结果,以水流量小不具规模开发而告终。村人看开发无望,麻烦不少,干脆填平了溪洞口,这场风波才以平息。

亮碑寺的由来

亮碑寺是因亮碑石而得名。此石碑立于庙前,据说该石碑整体通透,光洁发亮,在天气晴朗时,隔石碑能观南山上的一草一木,因之称为亮碑石,奇石。

亮碑寺前身为“灵官庙”,此庙坐落在一处高台上,三尺见方,高五尺左右,内供一尊灵官神像,浓眉大眼,络腮胡子,身披盔甲,脚蹬战靴,手持双鞭,庙门两边题有对联,上联: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下联:国泰民安天下太平,横匾为:灵官宝殿。此为当地居民们为了祈求一方平安,保佑子孙后代幸福的朝拜圣地。香火旺盛,辈辈平安无事。

后因庙小,年久失修,庙前坐落有亮碑,有村上头面人物出头招集商议,经10位居士化缘募捐,于元朝至顺4年(1333年),即惠宗妥欢贴睦尔顺帝登基元年,村中大兴土木,在灵官庙原址上扩建重修。重修后庙宇面积为五亩地大(约3333平方米)。入口处建古戏楼三间,进门处有铁狮一对,院内有铁斗子旗杆一对,再中间是生铁铸成的秦桧跪象头顶铁锅。院两侧各有厢房三间,东边还有禅房三间。北面有正殿七间,东边菩萨殿,西边太白殿。东侧偏殿为瘟神殿,西侧偏殿为娘娘殿。寺内建筑整个雕梁画栋,精工细作。东南侧建有亮碑楼,亮碑周围有护栏保护。北侧紧挨着是钟楼,内有用石条搭建的钟架,架着几吨重的铁钟。钟响,声闻十里。戏楼西边空地植有四株柏树成方阵形,向北又有两株柏树以及大殿前那棵树冠已参天的大柏树相呼应,构成了一幅北斗七星图形,匠心甚是讲究。戏楼下庙门外是东西道路,在道路的南边有三亩官地,归寺院管理,供庙内僧人耕种,或作每

●西安风情●

年一次的庙会活动场所。从此庙宇正式命名为“亮碑寺”。由于马嘶坡村按照地理位置,分为三社半:南社、北社、西社和半社,南社在库峪河上游的西岸修有龙王庙,北社在库峪河的下游西岸修有财神庙,西社在东西和南北交叉的什字修有土地庙,因此,习惯上也喜欢将亮碑寺称作大庙。一时长安城南,名声雀起,朝拜者络绎不绝,香火空前旺盛。

月转星移,光阴荏苒。1644年清兵入关后,兵荒马乱,盗贼四起,寺内建筑被烧毁,文物多被盗失,亮碑也从此不知去向。寺庙从此败落。清康熙五十二年(1714年),村上又筹集资金,恢复重建。建成后东厢是瘟神殿,西厢是送子娘娘殿,北面正殿东边三间是菩萨殿,西边三间是太白殿。这时因为亮碑没有了踪迹。寺庙从此更名“自龙宫”。并定于每年农历二月初六为娘娘婆庙会,期间村上请来戏班子连唱几天几夜戏,白天还伴有社火,晚上伴有狮子龙灯舞,给娘娘婆还愿的人们络绎不绝。1950年神像被搬除,牌楼被拆除。1958年大跃进期间大炼钢铁,寺庙里的大钟和秦桧跪像均被捣毁。寺庙变为马嘶坡小学,直到



1974年学校从此迁出,同时庙内十几棵古柏被砍伐,六间房屋被拆。1975年初变为下乡知识青年居住点,知识青年全部返城后,一度成为养猪场。

1986年,在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允许下,村上居士们研究决定重新恢复原来的“亮碑寺”,便请来光慈大师,清除院内杂草,修补危房,1990年7月翻修大殿,次年秋盖起山门,1995年春季重塑佛像,正殿为“大雄宝殿”,东厢为菩萨殿,西厢为地藏殿。2000年初又建起了天王殿,“亮碑寺”从此又重现辉煌。亮碑石的传说

“亮碑石”是奇石,实为宝贝。传说,在距今1860多年前的一天,秦岭北麓周惠王的后裔们居住的东八里塬和西少陵塬之间的大峡谷里,天空中突现一道白光,有物体直向地面垂直落下。正在田间耕作的不少村民发现了这一景观,随着都朝着一个方向奔去,争先目睹这天上掉下来的神奇不速之客。结果在周围找遍了,什么也没有发现。

其实,从天上掉下的东西,这时已经穿过了深厚的土层,有半截戳进了地下水层中。这一举动非同小可,惊动了正在府中午休的灞河神。河神马上升帐问事,有小神禀报:有一不明之物造访,请河神定夺。河神询问:来者何物?答曰:我乃蟠桃核。又问:来此何干?答曰:天宫王母娘娘在仙界举办蟠桃会,不料被天宫中不懂规矩的猴子弼马温大闹一场搅了局,砸了蟠桃园,偷吃了老君仙丹,还到蟠桃筵上喝光了王母娘娘的琼浆玉酒,卷走了筵席上的好吃东西,说带回去要让他的猴子猴孙们尝鲜。在回花果山猴窝的路上,他还边走边吃,我就是他吃完蟠桃随手扔下的桃核。



不幸打扰了河神,请河神恕罪!河神一听是孙悟空淘气,心想这猴子和东海老龙王都是老交情了,称兄道弟的,我能奈何?便说:既然如此,我就送你个人情吧,你现在是地处水土两界,就由土地神管你吃,我管你水喝,你在此安心修炼,日后能修成正果后,可回仙界享受供奉!蟠桃核一听,连连致谢!

话说天宫的蟠桃园,自被孙猴子金箍棒一顿乱打乱砸遭此劫难后,树园是杆断枝折叶落,一派狼籍。此后就繁华不在,一片凋零。有一天,有株一直在生死线上挣扎的老蟠桃树,看到自己也已干枯了的身躯,已无能力抚育自己后代成长,面对自己的三个女儿,叹息地说:我的孩子,你们现身吧!顿时,只见树枝上仅有的三朵花蕾,摇身一变成为三位少女,齐齐地跪倒在老蟠桃树面前。老蟠桃树有气无力地对三姐妹说:妈妈虽然哺乳了你们,但已无能力抚养你们,妈妈为了你们将来能有一个好的归宿,安排你们去人间投靠蟠桃仙

子去,她和你们是同门同宗,只是早比你们出生了五百多年,被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投入到了下界,被东土的灞河神和当地土地神收留,时过五百年,现在她也该有出头的日子了。话音刚一落,老蟠桃树就已枯死,再不能言。三姐妹知道母亲已去,再也无法挽回,只好对着老母亲叩了三个头,然转过身来,按照母亲嘱托,朝下界东土的长安城灞河流域一带寻找自己的前辈蟠桃仙子去了。

三姐妹来到下界的东土灞河流域,凭借自身的气息特性,在这一区域仔细寻找。终于在库峪河和清水河的三角洲地带,寻觅到了踪迹。在一个不大的小庙前看到了一束从地层深处透射出来的凡人感觉不到的光彩,走到近处辨认气息,知道了正是她们要寻找的蟠桃仙子,三姐妹兴高采烈,喜出望外。此地正是惠姓居民祭拜神灵祈福的灵官宝殿前。

三姐妹高兴过后,这才意识到,地方虽已找到,却还没见到要找的蟠桃仙子,又着急起来。

此时已是深夜。三姐妹空腹劳累了一整天,又饥又渴,又累,加上黑暗里的恐惧,竟毫无办法可想,急得快要哭出声来,合起声来喊:“蟠桃仙子,快来救救我们!”说也奇怪,呼叫了三声之后,一棵蟠桃核竟直从地下钻了出来。三姐妹见状,知道是蟠桃仙子现身,连忙拜倒,口称:“蟠桃仙子,我们是您的同宗晚辈,奉母之命前来投靠,我们已无家可归,请一定收留我们。”说话毕,抬起头来一看,刚才的蟠桃核开裂,从中站起了一位身着素衣的蟠桃仙子。三姐妹见仙子现了真身,就连忙低头再拜。蟠桃仙子说话了:“天庭的巨变,我已知晓。我在这里修炼了五百年,时至今日,天

●西安风情●

数已至，也该我成正果了。这个地方人杰地灵，民风纯朴，我不愿离去，虽然玉帝已同意我在此地颐养千年，采天地之灵，享受人间香火供奉。只是往后我也帮助不了你们多少。不过，你们既然已来投奔于我，我会交代土地神照顾好你们的。你们放心吧！”说完，她口中又念叨了一句什么语词，土地神从一旁钻了出来。口称“仙子招唤我，小神来也！”仙子对土地神说：“谢谢土地多年照料，使我丰衣足食，得以安心修炼。如今我已功德圆满，修成正果，要领命去了。我这三位亲戚就交你照料了，请你帮助她们在人间得到一个好的归宿，不负她们不辞辛苦奔波万里来投靠我的一片用心。”土地满口答应说：“仙子放心，这事全包小神身上。”听完土地的话，仙子微微一笑，算作回答。然后告诉三姐妹要好自为之。转身就不见了。在仙子刚站立过的地方，蟠桃核不知去向，耸立起了一块见方的大石碑。三姐妹见状大呼小叫。呼唤着：“仙子，不要离开我们！”土地明白，仙子已去了，无法挽回，急忙劝住三姐妹。说：“天数已然，不可抗拒。这石碑便是仙子的化身，望你们以后好好地守护她。”三姐妹听说后，只好对着石碑三拜后作罢。然后，土地帮着她们一块在灵官殿与石碑的侧旁搭起一间茅庵，安顿他们暂且住了下来。

为了思念仙子，三姐妹每天朝石碑跪拜烧香，并用干净布反复擦拭石碑上的灰尘。时间一久，石碑越擦越亮，到了后来，石碑居然洁白如玉，通体透亮，隔碑能见背面物体，这才醒悟到昔日蟠桃仙子临去一席话暗藏玄机。这块碑就是仙子修炼成的真身。从此，更是爱护有加。惠姓村民及附近村村民皆以石碑为仙物，前来参拜，香火不断，均称其为亮碑。

三姐妹除了继续经管亮碑外，也耕种着庙前的一片官地，过起了自耕自织的民间生活。有时也收受一些香火钱和供祭品，以补给生活不足。惠姓村民，心地善良，虽为她们的来历感到蹊跷，但也不深究，与她们友好相处，时常接济她们，使她们很快融入这块乡土中。

几年后，三姐妹辛勤耕作，生活上已能自给自足，并在忙闲时在大路两旁植树，后来形成了绿荫大道，此道路因为经常有陕南和外 地商人通过前往长安城，所以得名为“官路壕”。特别在村北有棵大槐树，在灵官殿旁即后来扩建后的大庙中有棵大柏树，树冠参天，枝叶茂密，一直存活到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据说就是三姐妹当时所植。

再说，村中有位惠姓长者，为人质朴，能主公道，村民有事都多求于他，他也乐于助人，因此得个好名声，人们都喜欢称呼他为“先生”。先生有三个后生，老大名为：勤劳，老二名为：仗义，老三名为：智勇。这三个后生都长得眉清目秀，一表人才，和他爹一样，勤劳朴实，为人忠厚，乐于助人，喜欢在干完自家活后，帮助一些干活缺少劳力的家庭。自从这三姐妹在此落户后，他们更是喜欢帮她们干一些力气活，如帮她们耕地播种，收割，她们栽树时，他们帮助挖坑，挑水等。三姐妹看这三个后生为人不错，也就乐于让他们帮助。日久生情，三姐妹对三兄弟，三兄弟对三姐妹都互相产生了爱慕，后大姐、二姐、三妹分别嫁给了勤劳、仗义、智勇。从此后，三家人分开居住，大姐随勤劳住到了南社，二姐随仗义住到了北社，三妹随智勇住到了西社。三家人都相安无事，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并分工轮流值守灵官殿，护理亮碑石。



陕西广播电视塔位于西安钟楼、南门中轴线南端长安南路南端,与大、小雁塔三角相望,整个塔体为八角形,塔楼似一盏宫灯,塔高 245 米,是西北地区最高的建筑物。整体平面成八角形,由塔基,塔座,塔身,塔楼,塔桅杆五部分组成,塔身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塔楼,塔桅杆为钢结构。是全国惟一一座多棱角电视塔,也是国内建成最早的混凝土电视转播塔。该塔于 1984 年 5 月动工兴建,1987 年竣工使用,总面积 4 万多平方米,承担中央台一套、陕台二套、教育台、陕广播台调频立体声等电视与广播节目的发射任务,是全省广播电视节目发射传输中心。塔楼上建有观光厅、旋转厅。登塔遥望,古城风貌尽收眼底,远处的秦岭也一览无余。成为西安市一大观光景点。

·解字·

“八”



这个“八”字虽很简单,但它仍是个会意字。甲骨文①和金文②都是表示一个东西被分成两半的样子。所以“八”就是“分”的意思。小篆③好像两个“人”背靠背的样子,所以也有“分别”之义。④是楷书的形体。

“八”当“分”讲的本义后来完全消失了。当数字用的“八”那是同音假借的问题,在词义上没有任何联系。

在《周礼·郊特性》中有“八蜡”一词。所谓“八蜡”,是古代奴隶主贵族在腊月祭神的名称。请注意:“八蜡”的“蜡”字应当读为 Zha(诈),这是个特殊读音。

“八”字是个部首字。在汉字中凡由“八”字所组成的字大都与“分”有关,如“小”、“分”、“半”等字。

周至道情

富小云整理



道情，是道教宣传教理教义为道教服务的一种民间演唱曲艺。最初宣扬道家的修身养性，以改恶从善为宗旨，也是道家所说的“点化”。周至道情的道教音乐色彩浓厚，至今保存着大量古代手抄剧本。演唱内容以“八仙

故事”为主，表现忠、孝、节、义，也有其他内容。演唱剧目有：《鞭打芦花》《百花山》《卖道袍》《八岔诗》《菊花亭渡母》《湘子渡林英》《小如贤》《杭州卖灵丹》《高老庄》《孝母得金》《状元及弟》《三孝让产》《吕蒙正赶斋》等。其音乐构成有五种波：高音波、短波、花音波、尾波、梅花彩调波等。板式有：苦音塌板、连板、代板、慢板、大板、平尾声塌板等。曲牌有：“皂落泡、一枝花、乌夜啼、牧羊关、雁儿舞、十三调、五更词、耍孩儿、梅花调”等。特点是：细致、婉转、悦耳、动听、热闹、红火，其中“波”（集体接音）是其他剧种少有的，使演唱更加生动活泼。周至道情的基本特征是：宣扬道家的修身养性，以改恶从善为宗旨，以“清、贤、高、载”四字为教义。清，是清净无为；贤，是贤寿重德；高，是高风亮节；载，是宣扬教义的意思。？

2007年5月，周至道情列入陕西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6月，被确定为西安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海内外中华儿女”提法的由来

1984年5月1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政协委员米暂沉写了《提请注意“炎黄子孙”一词的用法转中央宣传机关参考案》的提案。提案中说：“近期以来，中央领导同志讲话以及一般文字常用‘炎黄子孙’一词，代替‘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是指今天的汉族而言，但我们是个多民族国家，汉族虽占人口的最大多数，其他民族人数较少，但不能都归之于炎黄子孙范围之内，到今天我们也还设有民族自治区、州、县，如藏族、满族、蒙古族都有其独特的民族历史，不能以炎黄子孙包括起来……可否请中央宣传部门考虑加以纠正。”

198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在答复函中说：“关于‘炎黄子孙’一词用法，我们征询了国家民委、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单位的意见，经部领导研究并报中央书记处领导同志审定，今后对此词使用的意见是：在党和国家机关文件及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中，还是用‘中

华民族’代称中国各族人民更好一些。”

1990年3月10日，江泽民在研究进一步稳定边疆民族地区局势的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关于进一步稳定边疆民族地区的几点情况和意见》的讲话。讲话中就“炎黄子孙”和“中华儿女”提法作了规范和说明，他说：“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民族观的宣传教育，重点是各级领导干部、知识界以及青少年。对于容易触发群众性冲动的敏感问题，要慎重对待，及时妥善处理。要从增强民族团结、稳定大局出发，做好宣传舆论工作。比如，部分少数民族对‘炎黄子孙’等提法提出不同意见，可以研究在国内用‘中华民族’‘中华儿女’这样的词，以加强对各族人民的感召力。”

此后，在党和国家机关文件及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中，“中华民族”“中华儿女”这两个词逐渐代替了“炎黄子孙”。而在提到巩固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时，也多用“海内外中华儿女”“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等提法。





历史上真实的 女儿国

“‘女儿国’在历史上的的确确存在过，而且有一些村寨一直将‘女儿国’的古老习俗留存至今。”任新建说。任新建是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四川康藏研究中心副主任，他经过长期研究和实地考察发现，今天四川甘孜州的丹巴县至道孚县一带就是《旧唐书》中记载的东女国的中心。

东女国是否就是传说中的“女儿国”呢？据《旧唐书》第一百九十七卷《南蛮西南蛮传》记载：“东女国，西羌之别称，以西海中复有女国，故称东女焉。俗以女为王。东与茂州、党项接，东南与雅州接，界隔罗女蛮及百狼夷。其境东西九日行，南北 22 行。有大小八十余城。”

据任新建解释，按照《旧唐书》的记载，东女国南北长 22 天的行程，东西长 9 天的行程，如果按照过去一天骑马 40 公里或者步行 20 公里，那么东女国应该南北覆盖 400 公里到 800 公里，东西覆盖 180 公里到 360 公里。

据史书记载，东女国建筑都是碉楼，女王住在九层的碉楼上，一般老百姓住四五层的碉楼。女王穿的是青布毛领的绸缎长裙，裙摆拖地，贴上金花。东女国最大的特点是重妇

女、轻男人，国王和官吏都是女人，男人不能在朝廷做官，只能在外面服兵役。宫中女王的旨意，通过女官传达到外面。东女国设有女王和副女王，在族群内部推举有才能的人担当，女王去世后，由副女王继位。一般家庭中也是以女性为主导，不存在夫妻关系，家庭中以母亲为尊，掌管家庭财产的分配，主导一切家中事务。

历史上的东女国后来难道已经消失了？

《旧唐书》关于东女国的记载是十分详细的，但是到了唐代以后，史书关于东女国的记载几乎就中断了。难道东女国的出现只是昙花一现吗？

任新建说，唐玄宗时期，唐朝和土蕃关系较好，土蕃从雅鲁藏布江东扩到大渡河一带。可是到了唐代中期的时候，唐朝和土蕃关系变得紧张，打了一百多年仗，唐朝逐步招降一部分土蕃统治区的少数民族到内地，当时唐朝把 8 个少数民族部落从岷山峡谷迁移到大渡河边定居，这 8 个部落里面就有东女国的女王所率领的部落。

当时东女国女王到朝廷朝见，被册封为

“银青光禄大夫”，虽然是虚衔，但是品级很高，相当于现在的省级官员。后来到了唐晚期，土蕃势力逐渐强大，多次入侵到大渡河东边，唐朝组织兵力反击，在犬牙交错的战争中，东女国的这些遗留部落，为了自保就采取两面讨好的态度。

后来，唐逐渐衰落直至分裂，土蕃也渐渐灭亡。土蕃崩溃后，曾经被他们统治的青藏高原重新回到了原来的部落时代，唐代分裂后，也没有力量统一管理，到了后来的宋元明三代，对于青藏高原地区的统治很薄弱，因此基本没有史料记载，一直到清代才把土司制度健全。而东女国的遗留部落有些由于靠近交通要枢，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女王死后没有保留传统习俗，逐渐演变成父系社会，而有一些部落依旧生活在深山峡谷，保留了母系社会的痕迹。

为什么东女国的习俗能够保留到今天呢？

任新建认为，随着社会进程的发展，这个地区至今仍旧保留着母系社会的痕迹，是适应当地生产环境的需要，这个地区处于高山峡谷之中，生产条件差，土地、物产稀少，如果实行一夫一妻制，儿子娶妻结婚后要分家，重新建立一个小家庭，以当地的经济能力根本无法承受，生产资料分配不过来。而且地处封闭的深山峡谷，和外界交流几乎隔绝，不容易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专家万建忠教授也认为，一定的生产力，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与之相配，在这种生产能力比较落后，相对封闭的地方，劳动强度不大，居民自给自足，男性的优势得不到充分的显示，女性掌握着

经济大权和话语权。另外还有一种深层的社会心理因素，保持母系氏族制度，表明了人们对过去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一种追念。

扎坝依旧保留着东女国的古老习俗

根据任新建的考察，历史上的东女国就处在今天川、滇、藏交汇的雅砻江和大渡河的支流大、小金川一带，也是现在有名的女性文化带。“而扎坝极有可能是东女国残余部落之一，至今保留着很多东女国母系社会的特点。”任新建说。

扎坝过去是一个区，现在有7个乡，5个乡在道孚县境内，2个乡在雅江县境内，一共生活着将近一万人。任新建在扎坝调查时发现，女性是家庭的中心，掌管财产的分配和其他家庭事务，与东女国“以女为王”相似，有的家庭有30多个人，大家都不结婚，男性是家中的舅舅，女性是家中的母亲，最高的老母亲主宰家中的一切。“很明显是母系社会的残余，经过现代社会的冲击，已经和原始的母系社会不完全一样，只是保留了一些基本特点。”任新建说。

扎坝人依然实行走婚，通过男女的集会，男方如果看上了女方，就从女方身上抢来一样东西，比如手帕、坠子等，如果女方不要回信物，就表示同意了。到了晚上，女方会在窗户边点一盏灯，等待男方出现。扎坝人住的都是碉楼，大概有十多米高，小伙子必须用手指头插在石头缝中，一步一步爬上碉楼。此外，房间的窗户都非常小，中间还竖着一根横梁，小伙子就算爬上了碉楼也要侧着身子才能钻进去，就好像表演杂技一样，这个过程要求体力好，身体灵活，这其实也是一个优胜劣汰的选择。第二天鸡叫的时候，小伙子就会离开，

古人的环保意识

环境污染或许是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环境保护则是古往今来永恒的话题。中国古代就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很多方面都体现出古人强烈的环保意识。

传说从五帝时起，国家就设置了虞、衡机构。虞、衡就是专门负责环保工作的。据史料记载，舜帝时代，为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舜任命了九官二十二人，其中之一便是虞官伯益。伯益负责

管理草木，治理山泽。这人很了不起，除了本职工作以外，还喜欢狩猎，喜欢与鸟兽打交道，谙熟鸟语兽习，把“驯养鸟兽”作为业余爱好。到了大禹时代，伯益又协助大禹治水、开垦种植、熟化土地等。南方的水稻就是从那时开始大面积种植的。

衡是虞的下设单位，它的工作比较具体，有林衡、川衡等。林衡负责巡视山林，植树造林，调拨护林人员和相关物资，还负责实施对相关人员的奖罚；川衡主要整治江河湖泊，保持水系畅通，既要抗旱，又要排涝。林衡和川衡在虞的领导和协调下，还要进行一些合作，譬如养山涵水、导流山洪等。

中国古代环保法令多以诏令、礼、律、禁

令等形式下达。其中诏令毫无疑问是国家法律，不得违抗。礼多是民间的约束或者叫规约，律和禁令可能是地方政府颁布的，也可能是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

“春三月，山林不登斤，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gǔ，捕鱼的网），以成鱼鳖之长。”据说此禁令产生于大禹时代，最迟也在先秦。这和今天实施的季节性封山育林、江河禁捕如出一辙。《礼记》里的规定就更加具体，什么时候可以伐木，什么时候可以捕鱼，什么时候可以网鸟，什么时候可以逮兽……件件桩桩说得清清楚楚。不仅定性，而且量化；不仅制约黎民百姓，皇家也不例外，违者必究。

《荀子·王制》更是将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了“保护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的先进理念，如“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

这些规定，并非哪一朝代所有，而是各朝各代都以国家的法律形式诏令天下，如秦代的《秦律·田律》、宋代的《宋大诏令集》等。

中国古代环境意识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古人崇尚自然，自给自足，不轻易杀生；二是国家颁发律令，主导环保，促进了民间的环保习惯的形成。

从此两人互相没有任何关系。男方可以天天来，也可以几个月来一次，也可以从此就不来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叫做“甲依”，就是伴侣的意思。女方可以同时有很多“甲依”，但也有极少数姑娘一辈子只有一个“甲依”，两个人走

婚走到老。

女方生小孩后，“甲依”一般都不去认养，也不用负任何责任，小孩由女方的家庭抚养。但奇怪的是，当地的小孩一般都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

历史上确有李元芳

李元芳本是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却因为电视剧《神探狄仁杰》拥有了数不清的超级粉丝。历史上真的有李元芳这个人吗？答案是，有。不过，历史上的李元芳并非狄仁杰的助手，而是明朝的一位普通官员，只方不圆的性格让他的官场生涯起起伏伏。他终其一生用只方不圆的处世哲学证明着自己的表字：子实。

李元芳出生于公元 1489 年夏天，甘肃秦安县人，由于自小聪慧伶俐，加上环境的熏陶和叔叔们的教育，18 岁就高中举人。

大约 30 岁时，李元芳被明世宗任命为顺天府宛平知县。宛平因地理位置特殊，所以历朝历代都备受重视。作为一把手的县令，虽然只有七品，却都由皇帝颁旨任命，不是一般人能担任的。李元芳怀着一颗忐忑的心来到宛平县。因为他早就知道，这里到处是朝廷高官、外戚或宦官家族。他们肆意侵占百姓的农田，欺压良民，可以说无恶不作。

上任后，李元芳发觉现状比想像中更糟糕，有三个案件让他寝食难安：一是村民状告建昌侯张延龄无故侵占民地；二是有人举报惠安伯张伟私藏罪犯，还暗中派人威胁举报人；三是东厂恶意诬陷张仲金等 7 人，全

部定为死罪。

张延龄是国舅爷，其姐是孝康皇后，所以对于他的恶行，一般官员都是睁只眼闭只眼。但一贯耿直的李元芳一面派人把建昌侯侵占民田的恶行调查清楚并写成材料暗中呈送张皇后，一面当庭判定：建昌侯所占民田悉数奉还村民，并做出适当赔偿；对建昌侯的处罚因涉及皇亲，交由皇帝裁决。在对待惠安伯私藏罪犯一案上，李元芳也毫不妥协，勒令他限期交出罪犯，并作好“自省书”，否则就“上报朝廷，由皇上决断”。惠安伯也听说这个“铁脖子”县令很难缠，不想此等小事闹大，只好服从。第三个案子有点棘手，因为东厂是皇帝的心腹，关进去的很难活着出来。李元芳在朝臣的帮助下，找到东厂负责的太监，当面据理力争，连续几次后，终于免去了张仲金等人的死罪。

为百姓疾苦奔走，冒死上书请求废除“七件事”

作为一方父母官，他深知百姓疾苦。于是，李元芳冒死上书：请求废除让宛平民众深受其苦的七件事，还谈及世宗皇帝炼丹求仙的害处。上书之后，他便“布袜青衣”，坦然等待受罚。

李元芳了解百姓,更了解自己的君王。作为明朝的第十一位皇帝,明世宗朱厚璠即位初期对内整顿朝纲、减轻赋役,对外抗击倭寇,首创“中兴时期”,但在位后期便开始不视朝政,炼制丹药,导致宦官专权。更可怕的是,躲居深宫的世宗最反感臣子上书,连名闻天下的海瑞都因谏言而下狱。

李元芳上书后,5天没有消息。当时群臣们纷纷议论说,“看来此次他是凶多吉少了”。谁知世宗皇帝并非昏庸到底,看完奏折后一一批准了。这可能与他后来一直不杀海瑞有同样的心理。消息传下来,宛平县百姓欢欣鼓舞,拍手称快。

受人陷害辞官还乡,其故居至今犹存

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兴国镇合作巷29号是一处充满书香气息的院落。小院墙用灰砖砌成,面阔三间,进深两间,两边各有耳房,小廊曲径,清幽雅静。廊柱和金柱之间用穿插枋连接,前檐柱施额枋、平板枋,正中的檩子下配有透雕花板。这小院便是李元芳故居,也是秦安县保存年代最久的一座古民居建筑,2005年被秦安县人民政府列入县级文

物保护单位。

400多年前,以直言进谏而闻名全国的李元芳在天命之年便带着一颗苍老的心回到这个小院,开始颐养天年的日子。回想自己的官场生涯,他没有为自己方直的性格后悔。当年七条谏书受皇帝批准后,有人以为世宗对李元芳青睐有加,便推荐让其担任台谏——负责专职为皇帝提意见。宦官们暗中多方阻挠。李元芳在朝中没有后台,也从不结交权贵,最后只得出任登州府(今山东蓬莱)同知,几年后转任山西潞安府(今山西长治)同知。其间,由于政绩显著,山西巡抚和按察使一起呈文,请擢升李元芳任潞安府知府。谁知,先前在宛平县得罪的惠安伯等人联合宦官,诬告李元芳“拉拢关系,巴结上司”,虽然最后吏部查无实据,不了了之,但李元芳受不了这种打击,称病回归故里秦安,闭门不出,颐养天年。余生里,他一边梳理自己的人生,一边教书育人。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李元芳与世长辞,只留下一篇《安命赋》和一世清白名声。



市地方志办公室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11月19日下午,市地方志办公室召开全市地方志系统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专题辅导大会。会议由办党组书记、主任冯艳阳主持,会议邀请市社科院张永春研究员为市地方志办公室全体人员和各区县修志机构工作人员做了专题辅导讲座。

张永春研究员以《十八大报告的重点创新》为题目,从科学发展观列入党的指导思想、全面小康社会从建设到建成、总体布局由“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等7个方面介绍了十八大报告的创新之处,对全市地方志系统工作人员进一步学习领会十八大精神起到了积极的启迪作用。

我市地方志系统全体人员一致认为,党的十八大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攻坚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党的十八大报告把文化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不仅表现在报告中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思想和目标,还表现在它对文化在整个社会发展中地位与作用更全面的认识。地方志系统要紧

紧抓住文化建设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一要求,结合我市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实际和群众需求,以丰富的地情资料和多种途径进一步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以优异的工作成绩为我市国际化大都市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办党组书记、主任冯艳阳强调,一是全体人员要深刻认识到学习十八大、宣传十八大、贯彻十八大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这次学习活动只是揭开了全市地方志系统学习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序幕,下一步全市地方志系统通过采取集体学习、个人自学、撰写心得体会文章和召开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对十八大报告原文和章节进行深入学习。二是全市地方志系统要安排部署好学习贯彻落实活动,各区县地方志办公室要把学习十八大与当前地方志各项工作结合起来,认真抓好落实工作;市地方志办公室机关要以党总支、党支部及处室为单位,对学习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做出具体安排,迅速在全市地方志系统掀起学习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热潮。

西安市第二轮 修志工作分类座谈会召开

为进一步加快市志初稿撰写进度,提高编撰质量,扎实推进编纂工作,11月6~8日,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召开西安市第二轮修志工作分类座谈会。市志承编单位以板块归属不同,按照“政治部类”“经济部类”“总类及科教文卫等相关部类”划分,分别展开座谈。全市100余家承编单位的130余位主编、主笔参与座谈交流。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西安市志(1991—2010)》执行副总编张帜及总编室各分志责任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邀请了省地方志办公室市县志处处长张世民,《西安市志(1991—2010)》总编室顾问王文振、董健桥、蒋纪新分别参加各部类的座谈,解答承编单位提出的疑问,为各承编单位提供修志业务指导。

座谈会分别由各板块的协调人王耀珍、高共青、杨军亚主持。首先由主持人介绍二轮市志编修工作的总体进展情况,之后各承编单位主笔一一发言。发言内容不仅包括各单位修志工作的进度,很多分志主笔还介绍了本单位在推动修志工作中采取的好做法以及获得的好经验,也提出自己在参与修志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总的来看,100多个承编单位基本上都做到了领导重视、机构健全、人员到位,工作进度符合市政府统一要求。

张世民、王文振、董健桥、蒋纪新分别与承编单位的代表进行了交流,并解答所提问

题,为承编单位少走弯路、加快进度提供专业建议。

张帜充分肯定了各承编单位前期的工作成绩,并代表市志总编室对近期及下一阶段的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确保工作进度。2015年全面完成二轮修志任务是省政府下达的目标任务,为此,市政府已于去年底专门下发了《关于调整第二轮修志工作进度的通知》,要求今年5月底前各承编单位上报初稿,年底前各分志牵头单位上报分志初稿。对照新的进度要求,目前还有部分承编单位相对滞后。此次会后,各承编单位特别是相对滞后的单位一定要抓紧时间,迎头赶上,务必于11月底前向分志牵头单位和市地方志办报送初稿。年底前,市地方志办将向市志编委会作专题汇报并向全市通报各单位修志任务完成情况。二是确保志稿质量。不能因加快进度而忽视稿件质量,要按照地方志书质量要求,规划和检查修志工作的每一个步骤和环节,多向本单位熟悉情况的老同志请教、求证,多与市地方志办相关分志负责人沟通、交流,确保志稿的全面性、客观性和规范性。各单位要进一步重视图、照资料的搜集和运用,以便更加准确、真实地记录和展现历史,增加志书可读性,使二轮志书更加符合时代特点。三是确保修志队伍稳定。修志工作的特点是“四快一慢”,启动快、培训快、拟定篇目快、搜集资料

西安市第二轮 区县志编纂质量研讨会召开

2012年10月29~31日,西安市第二轮区县志编纂质量研讨会在长安区召开,会议由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主办,长安区地方志办公室承办。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冯艳阳,副主任张帜,各区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主编、业务骨干等40余人参加了会议研讨交流。长安区副区长李红到会致辞,表达长安区委、区政府对实现全区各项事业大发展、大跨越的坚定信念,表达长安区领导对地方志工作的关心厚爱 and 大力支持,表达长安区对各位与会同志的欢迎。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市县志处处长张世民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指导性发言。

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冯艳阳出席会议开幕仪式并讲话。讲话中,冯主任通报了各区县修志工作的大体进展情况,指出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下一阶段的工作安排提出了明确要求:一是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准确把握我市区县二轮修志的工作现状。从全省来看,我市区县二轮修志整体推进良好,但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不容忽视;二是多措并举,扎实推进,促使区县修志工作进一步加快;三是各区县要借助召开业务培训会、研讨会、编发修志简报等形式,着力提高编修人员的整体素质,提升修志工作的社会影响力;四是各区县要切实提高修志人员待遇报酬,关心修志人员工作生活,从而激励起修志人的工作热情,使其更积极主动为修志工作做出贡献。

研讨中,与会同志紧紧围绕如何提高区县志书编纂质量的议题进行了深入地交流切磋,发言围绕会议研讨议题,诸如关于实事求是记述民国政府、“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的问题,关于提高志书政治质量的问题,以及优化篇目结构、合理取舍资料、记好乡镇街道与“非遗”的问题,都程度不同地从各个方面深化了提高区县志编纂质量这一研讨主题。会后张帜副主任指出,要通过加强对各区县地方志办公室的指导、各区县之间的沟通,创建一个和谐愉快的修志环境,进一步促进我市第二轮区县志编纂工作。

快,但撰写志稿要慢,这个“慢”不是说可以拖拖拉拉,而是要求“反复打磨”、“精心打造”。各单位不要以为写完初稿就万事大吉,之后还有初稿的多次返稿、定稿,分志稿的总纂审稿,以及全志的初审、终审等,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会涉及各承编单位。因此,在二轮市志正

式定稿前,各单位的修志机构不能撤销。

这次会议增进了各承编单位之间的相互了解,加强了各承编单位之间的相互交流。很多代表表示,其他同志的发言对于推动本单位的修志工作很有启发和借鉴作用,很多疑问经过与会专家的指导都得以解决。



《西安年鉴》(2012 卷)出版发行

近日,由西安市人民政府主办、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西安年鉴》(2012 卷)出版发行。该卷年鉴由西安出版社出版,共 120 万字,有彩页 56 面,内文图片 350 余幅,表 66 个,条目 1926 个。以翔实的记述、精美的图片和装帧设计,全面、客观地记录了西安市 2011 年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所取得的新进展、新成就。

《西安年鉴》创刊于 1993 年,国内外公开发行,是西安市唯一全面记述全市各项事业发展情况的大型综合性资料年刊。截至 2012 年底,《西安年鉴》已连续编纂出版 20 卷,其

在资料的全面性、系统性、权威性方面是其他刊物所无法比拟的,本身已经成为西安重要的信息资料库。《西安年鉴》曾连续四届获得中国版协组织评选的“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特等奖”,成为西安文化的“亮丽名片”,在宣传展示开放、包容、人文、现代、活力的西安新形象,为西安创建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为响应市委、市政府服务全市广大人民的精神,该年鉴已连续数年向全市各级机关团体、大专院校、图书馆、档案馆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免费赠阅。 (高 鹏)

中国楹联简史



楹联是题写在楹柱上的对联,亦指对联,是我国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它始于五代,盛于明清,迄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早在秦汉以前,我国民间过年就有悬挂桃符的习俗。所谓桃符,即把传说中的降鬼大神“神荼”和“郁垒”的名字,分别书写在两块桃木板上,悬挂于左右门,以驱鬼压邪。这种习俗持续了一千多年,到了五代,人们才开始把联语题于桃木板上。据《宋史蜀世家》记载,五代后蜀主孟昶“每岁除,命学士为词,题桃符,置寝门左右。末年(公元九六四年),学士幸寅逊撰词,昶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一副春联。宋代以后,民间新年悬挂春联已经相当普遍,王安石诗中“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之句,就是当时盛况的真实写照。由于春联的出现和桃符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古人又称春联为“桃符”。

一直到了明代,人们才始用红纸代替桃木板,出现我们今天所见的春联。据《簪云楼杂话》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定都金陵后,除夕前,曾命公卿士庶家门须加春联一副,并亲自

微服出巡,挨门观赏取乐。尔后,文人学士无不把题联作对视为雅事。入清以后,对联曾鼎盛一时,出现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联佳对。

随着各国文化交流的发展,对联还传入越南、朝鲜、日本、新加坡等国。这些国家至今还保留着贴对联的风俗。

对联是由律诗的对偶句发展而来的,它保留着律诗的某些特点。古人把吟诗作对相提并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对联要求对仗工整,平仄协调,上联尾字仄声,下联尾字平声。这些特点,都和律诗有某些相似之处,所以有人把对联称为张贴的诗。但对联又不同于诗,它只有上联和下联一般说来较诗更为精炼,句式也较灵活,可长可短,伸缩自如。对联可以是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九言,也可以是十言、几十言。在我国古建筑中,甚至还有多达数百字的长联。对联无论是咏物言志,还是写景抒情,都要求作者有较高的概括力与驾驭文字的本领,才可能以寥寥数语,做到文情并茂,神形兼备,给人以思想和艺术美的感受。



“衣冠禽兽”原是褒义词

“衣冠禽兽”一语来源于明代官员的服饰。据史料记载，文官官服绣禽，武官官服绘兽。品级不同所绣的禽和兽也不同，具体的规定



是：一品绣仙鹤，二品绣锦鸡，三品绣孔雀，四品绣云雁，五品绣白鹇，六品绣鹭鸶，七品绣鸳鸯，八品绣黄鹂，九品绣鹌鹑。

武官一品、二品绘狮子，三品绘虎，四品绘豹，五品绘熊，六品、七品绘彪，八品绘犀牛，九品绘海马。

文武官员一品至四品穿红袍，五品至七品穿青袍，八品和九品穿绿袍。所以当时“衣冠禽兽”一语是赞语，颇有令人羡慕的味道。

到了明朝中晚期，文官武将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声名狼藉，老百姓视其为匪盗瘟神，于是“衣冠禽兽”一语开始有了贬义。清代以后，“衣冠禽兽”一语遂用作贬义，泛指外表衣帽整齐，行为却如禽兽的人，比喻其道德败坏。

宋朝的三公经费

两宋时期，中央各机关和州军以上的地方政府，都有一个叫作“公使钱”的机构，也称公用钱，专门用于官署公筵及差旅供馈、迎送应酬、宴请赠礼等，差似今人所谓“三公经费”。各单位的公使钱额都有规定，对地方政府而言，其构成又分“正赐”、“遗利”等几个部分，正赐即财政拨款，遗利是机关办三产创收。

但是，库里有钱，特别是靠所谓“遗利”得来的非正赐钱，并不等于可以任意使用。一方面，主流舆论对公款吃喝玩乐多有非议。另一方面，中央对公使钱的使用有制度，有审计，监控很严。

仁宗时，知泾州滕宗谅动用公使钱犒赏辖境内羌人部落首领，又馈赠过客朋友，耗费十六万贯。监察御史梁坚弹劾后，中央派燕度追查。滕宗谅怕牵连太广，竟把燕度准备调阅的公使钱支出账目一把火烧光。其后虽经欧阳修、范仲淹竭力营救，最终未能逃脱“滕子京(字宗谅)谪守巴陵郡”的处理。

还有一个知潞州尹洙，因为借用公使钱替一个部将偿还高利贷被中央派员追查，连同此前在知渭州任上的公使钱支出细目也要求一笔一笔说清楚，由此留下一篇《分析公使钱状》，用现代话就是晒三公经费了。



古人常说学富五车 五车到底能装多少书？

需要指出,这“车”是马车、牛车,而不是大卡车。这词儿是描述战国时代的名家施惠如何勤奋好学的。他每次出个门,都要带上五车竹简在路上阅读。也不知道这一路颠簸的,他能不能看得进去,总之这范儿算是做足了。这五车竹简也没几本书,大概连精装版的《古文观止》也装不完。照这么个算法,咱们随便一个人都是学富几十、上百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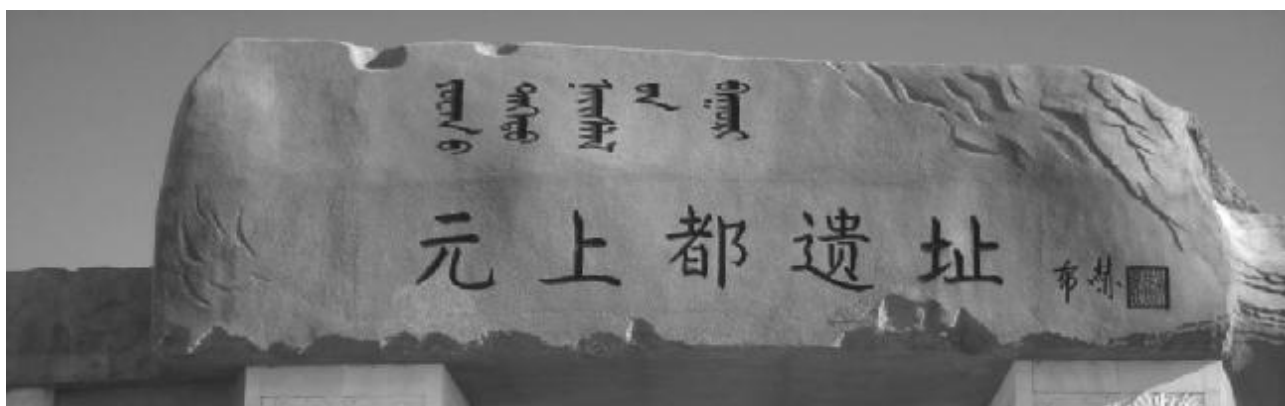
古人如何预测天气？

在商朝,运用眼睛耳朵等感官系统来观测天象,是很了不起的本事,在政府里混个高职完全不成问题。到了周朝,人们已经学会从动物的行为来预测天气了。秦汉时期,古人完成了二十四节气的制定。之后,农历的问世,更是历代祖先智慧的结晶。古人预测天气,虽然没有精密的仪器,但很多时候却比现在那些所谓的“天气预报员”靠谱多了。



古代是如何处理垃圾的？

古人比现代人可要环保多了。随手乱扔垃圾这种不文明的事情,很少发生。早在8000年前,古人就会将垃圾集中处理,利用天然的或挖掘而成的土坑来堆放垃圾。解决垃圾最快的方法是直接烧掉,烧不掉的就掩埋起来。古代垃圾场的遗迹里,大多数是碎裂的瓷器、漆器。拼一拼,说不准能还原一件古董。所以,想发横财的,可以翻翻古人的垃圾。



元上都遗址成为中国的 第 30 项世界文化遗产

2012 年 5 月 29 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的第 36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一致同意将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项目元上都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元上都遗址成为中国的第 30 项世界文化遗产。

元上都遗址曾经是元朝的首都,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南面的正蓝旗草原。公元 1256 年,忽必烈命刘秉忠在此地选址建开平府。1260 年,忽必烈在这里登基,成为元朝的开国皇帝,而开平府则成为首都。元上都遗址呈方形,站在城外的台基上,依稀可以辨认出当年城市的格局。上都城周长约 9 公里,

分为外城、内城、宫城三重,其中宫城是整个建筑的重中之重,是皇帝和后妃们夏季避暑时的居住之地,风格以自然为主。内城和外城则是官吏们的居住地。此外,在都城附近还有一座面积很大的御花园。而在遗产的缓冲区,有敖包群和保留到现在的蒙古族“敖包祭祀”等传统人文景观以及湿地、典型草原、森林草原和沙地等蒙古高原草原特色景观在内的遗址环境。

元上都遗址是中国元代都城系列中创建最早、历史最久、格局独特、保存最完整的都城遗址。同时由于它位处中原农区与亚洲北

方牧区交接地带,在 13 到 14 世纪游牧民族从军事征战转向王朝治理的过程中,见证了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在冲突与融合过程中的独特产物——二元文化。两种文化的精髓在元上都的完美结合,以及这种兼容并蓄的城市模式,都使得这座古城在世界文明史和城市规划史上拥有独特的地位。





“掌故”原是汉文官

按照字典的解释，“掌故”多指对历史人物故事的考证叙述，带有一定的知识性和趣味性的文章。其实“掌故”在早期并不是指文章或轶闻，而是指一种朝廷命名的官职，准确点说，是汉代始设的一种国家文职官员。史



载，汉朝时，国家设置了一种名为“掌故”的官职，隶属于太常。太常下属太史，太史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太史的长官叫太史令。司马迁就是汉代有名的太史

令。太史令手下有许多官员，其中就有“掌故”一职。“掌故”专门负责管理收集国家历史故事，因其工作性质是掌管国家的“旧事”，所以称为“掌故”。“掌故”是汉代文学官的一种，但比文学掌故略高。“掌故”因为是朝廷正式任命的政府官员，因此，国家定期给他们发“工资”。据《汉书·儒林传》记载：“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二千石属。”按当时的生活水平测算，这笔俸禄可以养活19个人左右。这在当时社会已经算是“高薪阶层”了，待遇了得。由此可见政

●知识窗●

府对掌故一职的看重。《史记·儒林列传》中载：“是时伏生年九十有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汉书·司马相如传》中载：“宜命掌故悉奏其仪而览焉。”这都说明掌故当时在朝廷中，是个很显要的官，不仅平时工作量很大，也颇受政要的器重。

在汉朝，有些掌故是可以传袭的，掌故也由此成为“职业掌故”。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便是太史令（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一职），所以其父病逝后，司马迁承袭了太史令一职。《史记·龟策列传》中就有“孝文、孝武因袭掌故，未遑讲试”的记载。

由于掌故属于一种朝廷必需的史官，因此，历朝历代都很看重。唐代时，国家对掌故一职又做了细化，工作分工更为明确，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当时朝廷设有“内侍掌故”和“州郡掌故”，分别负责宫廷及各地流传的故事、轶闻、考证等。一上一下，一内一外，一朝一野，将国家的朝野逸闻、民间逸事等全

部记录下来。唐代时的翰林学士也有兼掌历史沿革的职能，所以也泛称“掌故”。宋代《鹤林玉露》卷八中记载：“平原犹豫不能决，欲留其人，处以掌故，其人力辞，竟去。”可见当时竟把“掌故”一职视作高官厚位来许诺。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掌故的范围逐渐扩大，已不仅仅限于朝廷任命的专职官员了，到宋、明、清三朝时，凡收集有关上层社会人士的逸事、朝野逸闻、民间传说等的人，都统称“掌故”了。而且，掌故的词性也发生了变化，由官职名变成了逸闻轶事、坊间趣话。宋人岳珂在《愧郗录·服章入衔》中有“此南渡而后，掌故散讹之失也”之句，清人韩泰华在《无事为福斋随笔》中也有“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于朝章掌故也，明于兵刑钱谷也”的记载。此时的“掌故”，则完全失掉了原有的含义，而单纯地指朝野逸闻、民间趣话了。



《游终南山》

◎ (唐)孟 郊



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
高峰夜留景，深谷昼未明。
山中自正，路险心亦平。
长风驱松柏，声拂万壑清。
到此悔读书，朝朝近浮名。

赏析：

欣赏这首诗，必须紧扣诗题《游终南山》，切莫忘记那个“游”字。

就实际情况说，终南尽管高大，但远远没有塞满天地。“南山塞天地”，的确是硬语盘空，险语惊人。这是作者写他“游”终南山的感受。身在深山，仰望，则山与天连；环顾，则视线为千岩万壑所遮，压根儿看不见山外还有什么空间。用“南山塞天地”概括这种独特的感受，虽“险”而不“怪”，虽“夸”而非“诞”，简直可以说是“妥帖”得不能再妥帖了。

日和月，当然不是“石上生”的，更不是同时从“石上生”的。“日月石上生”一句，的确“硬”得出奇，“险”得惊人。然而这也是作者写他“游”终南山的感受。日月并提，不是说日月并“生”；而是说作者来到终南，既见日升，又见月出，已经度过了几个昼夜。终南之大，作者游兴之浓，也于此曲曲传出。身在终南深处，朝望日，夕望月，都从南山高处初露半轮，然后再冉升起，这不就像从石上“生”出来一样吗？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王湾的“海日生残夜”，杜甫的“四更山吐月”，都与此同一机杼。孤立地看，“日月石上生”似乎“夸过其理”（《文心雕龙·夸饰》），但和作者“游”终南山的具体情景、具体感受联系起来，就觉得它虽“险”而不“怪”，虽“夸”而非“诞”。当然，“险”、“硬”的风格，使它不可能有“四更山吐月”、“海上生明月”那样的情韵。

●历代诗人咏长安●

“高峰夜留景，深谷昼未明”两句的风格仍然是“奇险”。在同一地方，“夜”与“景”（日光）互不相容；作者硬把它们安排在一起，怎能不给人以“奇”的感觉？但细玩诗意，“高峰夜留景”，不过是说在其他地方已经被夜幕笼罩之后，终南的高峰还留有落日的余辉。极言其高，又没有违背真实。从《诗经·大雅·崧高》“崧高维岳，骏极于天”以来，人们习惯于用“插遥天”、“出云表”之类的说法来表现山峰之高耸。孟郊却避熟就生，抓取富有特征性的景物加以夸张，就在“言峻则崧高极天”之外另辟蹊径，显得很新颖。在同一地方，“昼”与“未明”（夜）无法并存，作者硬把二者统一起来，自然给人以“险”的感觉。但玩其本意，“深谷昼未明”，不过是说在其他地方已经洒满阳光之时，终南的深谷里依然一片幽暗。极言其深，很富有真实感。“险”的风格，还从上下两句的夸张对比中表现出来。同一终南山，其高峰高到“夜留景”，其深谷深到“昼未明”。一高一深，悬殊若此，似乎“夸过其理”。然而这不过是借一高一深表现千岩万壑的千形万态，于以见终南山高深广远，无所不包。究其实，略同于王维的“阴晴众壑殊”，只是风格各异而已。

“长风驱松柏”，“驱”字下得“险”。然而山高则风长，长风过处，千柏万松，枝枝叶叶，都向一边倾斜，这只有那个“驱”字才能表现得形神毕肖。“声”

既无形又无色，谁能看见它在“拂”？“声拂万壑清”，“拂”字下得“险”。然而那“声”来自“长风驱松柏”，长风过处，千柏万松，枝枝叶叶都在飘拂，也都在发声。说“声拂万壑清”，就把视觉形象和听觉形象统一起来了，使读者于看见万顷松涛之际，又听见万壑清风。

这六句诗以写景为主，给人的感受是：终南自成天地，清幽宜人。插在这中间的两句，以抒情为主。“山中人自正”里的“中”是“正”的同义语。山“中”而不偏，山中人“正”而不邪；因山及人，抒发了赞颂之情。“路险心亦平”中的“险”是“平”的反义词。山中人既然正而不邪，那么，山路再“险”，心还是“平”的。以“路险”作反衬，突出地歌颂了山中人的心地平坦。

硬语盘空，险语惊人，也还有言外之意耐人寻味。赞美终南的万壑清风，就意味着厌恶长安的十丈红尘；赞美山中的人正心平，就意味着厌恶山外的人邪心险。以“即此悔读书，朝朝近浮名”收束全诗，这种言外之意就表现得相当明显了。

